

## 内 容 提 要

基督教青年会兴起于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19 世纪末随着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传入中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本着基督精神，强调“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奉献社稷的原则来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在新、旧文化交接之际，创新与传统纠缠不清之时，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引入中国，并培养了一大批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青年。

本文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研究中心，从青年会的历史沿革、青年会与平民教育、青年会与公民教育、青年会与近现代体育以及青年会的教育出版事业五个方面入手，从宗教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的角度，对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基督教青年会非常重视社会教育，开展的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运动都致力于提高一般平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受到学界与政界的欢迎和赞许；青年会还十分重视近代体育事业发展，对我国体育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影响深远；另外青年会的出版事业也是其推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基督教 青年会 中国近现代教育

# ABSTRACT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rise Britain in will it be middle period the 19th century, with student wish overseas to preach sport introduce China to American have will it be the end the 19th century. 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in line with Christ spirit, emphasize devotion on " not to be ministered unto, but to minister " principle of state is it recommend to spiritual, mental, physical, social. When new and old culture is handed over , while innovating and is made very complicated with the tradition, introduce western science cultural knowledge into China, and has trained the large quantities of young men helpful to country and society. This text regards 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as the research center, fro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d common people's education ,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d citizen's education ,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d five respects of publish cause of education of sports and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modern times start with, from multi-disciplinary , interdisciplinary angles , such as religion studying , history , pedagogy ,etc., is it deepen discussion to go on to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relation with China's near modern education.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education, common people education that launches and citizen's education move and is all devoted to improving general common people's cultural knowledge level, well received by educational circles and political circles and praise ;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still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odern sport to develop, far-reaching to sports professionalism of our country , specialized , socialized influence; The publish caus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s its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ursueing education too in addition.

**Key words:** Christianity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Education of modern China

# 中文摘要

## 第一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沿革

基督教青年会最初是由一位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于 1844 年在英国伦敦创立的。1885 年在福州的英华书院和北通州的潞河书院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青年会。1896 年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并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华基督教学塾青年会。从 1902 年城市青年会正式加入全国组织至 1912 年青年会得到北京政府的正式承认，共十年间为青年会的初步发展时期。1912 年至 1922 年为青年会事工迅速发展的时期。1922 至 1927 年，中国社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青年会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走向衰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后来成功的拓展是奠定于它早期的发展，而它早期的顺利发展则是由于清末有利于其发展的外在环境以及它本身的组织文化使然。而青年会在中国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

## 第二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平民教育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运动，主张教育救国、教育平等。这场运动起源于一战期间赴法华工的识字教育。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教材教法不断完善，民众教育不断丰富。尽管平民教育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愚、穷、弱、私”的状况，也无法改变与此相关联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但普及了文化，提高了社会对文化知识的渴求。本章最后还分析了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思想内涵及其特点，指出了它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价值和影响。

## 第三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运动于 1923 年的第九次全国大会正式议决青年会应提倡公民教育运动，将对于内政外交必须有之知识，灌输于人人脑海之中而使公民必须有之能力，可以尽量地发展，对内有建设的组织及事业，对外有平等的精神及合作，以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青年会公民教育运动到 1927 年发展到一个高潮，各地均相当活跃地对公民教育予以尝试和提倡。公民教育运动是

青年会与时代互动的结果，既含有去除不平等之束缚的对外要求，也含有澄清国内政治的对内要求。自青年会发起公民教育以来，政学各界非常赞许，因为其不仅显示基督教爱国，认同国家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提出建立现代国家，是切合时代急需的运动。

#### **第四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体育**

近代中国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基督教青年会密不可分的。本章节从传播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引进和推动近代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展；举办专业运动会和组建体育机构；培养体育专业人才；开辟体育场地和推动社会体育活动；促进体育研究及体育书刊的出版等六个方面考察青年会与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历史。

#### **第五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教育出版事业**

基督教青年会的出版事业也是其推行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种商业经营，从中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而更主要的是，它可以传播青年会的基本思想，扩大青年会的影响，并结合不同的形势，发挥青年会在各方面的各种作用。本章共分四节，论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教育出版事业。前两节叙述了青年协会书局的创立发展的历史和介绍了青年协会书局的一些主要发行刊物。青年协会书局是一个完全由中国基督徒开办的新教出版机构。在那个时代，青年协会书局的出版物被公认在思想上是比较先进的。它出版的一些优秀译作和原创作品涵盖了宗教、哲学、文化和社会学诸领域。第三节特别介绍了曾对全国青年有过较大影响的刊物《青年进步》。《青年进步》在如何通过对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讨论传播基督教教义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该刊语言朴实，观点明确，读者通常都将它视为良师益友。本章的最后介绍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青年会刊物。

## 前 言

基督教青年会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长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自 1844 年第一个青年会在伦敦建立至今，青年会已有近 160 年的历史。它的影响遍及全球，至今未已。有统计资料显示，如今，青年会在世界 110 多个国家共拥有 3 千万会员，它为世界各国的人们、特别是为青年提供多种服务。

青年会于 19 世纪后期传入中国，曾对近现代中国城市社会产生过不少的影响。它并不局限于宗教生活，而积极关注各种社会问题。根据“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青年会特别强调社会服务，经常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活动，服务于社会大众。青年会的这种性质使青年会得以广泛接触和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也使它明确地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社会为自己追求的目的。20 世纪前期是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界相当活跃的时期。青年会的活动，其实只是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多种努力的一部分。当时，局势动荡，政府对局面的缺乏控制使各种社会势力有可能比较自由的活动，传统意识形态被打破，新的思想体系尚未成型所造成的社会价值观念的空缺，也为各种理论和思想派别的活动提供了空间。这正是包括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内的思想界格外活跃的客观环境。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有的从实践入手，有的从理论着眼，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则比较激进，有的把改善物质生活与条件放在首位，有的则强调社会的心理建设与精神构建。具体方式上虽然不同，但基于同样的希望——使中国尽快强盛。

国内对于中国青年会的历史进行认真而又客观的研究是在 80 年代以后。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里，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人们对于青年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并不持肯定的态度，从当时有关青年会的正式出版物中不难发现，对青年会的评价大多都是批判性的。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提倡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加之“基督教研究热”的出现，使中国青年会的历史不断受到学者的关注，对它的评价也不同于以前。

顾长声算是较早涉猎中国青年会研究的一位学者。他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一书中，以“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为题，专章论述了青年会的传入以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会在中国开展的德、智、体、群几个方面的活动。尽管作者的介绍只是概略性的，但是作者的观点却是非常鲜明的。他肯定青年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活动是爱国行为，也承认青年会所提倡的一套改良主义，例如劳资合作、不抵抗主义和唯爱主义等持否定态度。他还认为，青年会举办的旅馆业、电影院、健身房、餐厅和其他娱乐设施等收入，是剥削收入，甚至最初由青年会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也只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对消除中国的灾难丝毫无用。很显然，作者对于青年会的认识，较之以前的全盘否定论已经有了突破，但因为成书于改革开放之初，作者尚未能完全摆脱传统观点的影响。

进入 90 年代，关注中国青年会历史的学者开始多起来，而且在研究角度和观念上

又有了更新。王旭、黄柯可编著了《城市社会的变迁》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其中一篇文章是王立新所写的《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城市改良》。作者论述的是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城市公共卫生运动、青年会在中国的城市改良运动和女青年会的工业改良运动。新颖的视觉和合理的分析是本文的特点，文章对于青年会的城市改良运动展开了具体的论述，既看到其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指出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局限。比起前人对于改良运动的看法，王立新的分析更有说服力。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是学者顾卫民的力作。该书第九章有一节专门介绍青年会在30年代以前的发展概况及其原因。文章指出，基督教青年会是二十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变故都有直接关系；也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的领导分不开；还与美国政府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北美协会<sup>1</sup>的大力支持相关联；而青年会自身对中国社会环境变迁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这也是它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作者对于青年会的发展所作的分析合情合理，但毕竟只有短短几页的篇幅，很多方面没有展开讨论，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前面的几本著作都不是研究中国青年会的专著，只是用专章、专节或专文论述青年会的历史而已。由于篇幅的限制，学者们的研究不可能非常深入而全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到了80年代末，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了陈秀萍<sup>2</sup>编著的《沉浮录——中国青年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1989年），该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产生、发展、受挫与复苏的过程，是国内现有的唯一一本青年会历史的专著。作者将男女青年会结合起来论述，范围囊括整个中国。笔者认为，陈秀萍对于中国青年会历史的研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将中国青年会百多年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且比较客观地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本书并非学术专著，因此，其写作采用的是重在陈述的手法，分析较少，理论性不足，尤其是与青年会相关的理论问题很少涉及。此外，作者对青年会传入中国的国际国内社会背景所作的介绍也太少。从本书选取得资料来看，中文资料较多，外文资料很少。

综观现有国内学者对于青年会历史的研究，不难发现其共有的特点：学术研究氛围的宽松和思想的逐步解放，使他们能够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看待青年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然而，学者们的探讨仍多处在初期阶段，其研究大多是广而不专或者专而不详，很多问题尚欠深入，相关资料的不足大概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1949年之后，青年会在台湾和香港的历史没有中断，这对于港台学者的研究是非

<sup>1</sup> “北美协会”全名为美国和加拿大青年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YMCA of U.S. and Canada），是为了适应北美地区青年会的迅速发展的需要而成立的一个跨国组织，成立于1889年。

<sup>2</sup> 现任浙江丝绸工学院副教授，此书曾获中国青年运史学会1989年任时青运史研究基金三等奖

常有利的。台湾学者对于中国青年会的历史非常关注，其研究也比较深入，从他们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把青年会放到基督教的大范围中加以研究，例如台湾的魏外扬和查时杰<sup>3</sup>等教授。另一类是，对中国青年会的领袖人物和具体活动的专门研究，台湾的王成勉教授是其主要代表。他们的研究之突出特点是，资料丰富，理论扎实，分析深入。以查时杰教授为例，他是研究民国时期基督教史的专家，在《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一书中，查教授对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和受挫以及后来的本土化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另一位研究中国青年会的台湾学者是王成勉<sup>4</sup>教授，王教授对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其人其事的研究，可以说是颇为精细。他撰写的《余日章与青年会——一位基督教领袖的爱国之道》，（载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论述了作为中国青年会领袖的余日章，于20年代基督教在中国面临挑战的艰苦时期，既坚守基督徒的立场，又不失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动。

相比之下，香港学者在中国青年会的研究方面似乎要逊色一些，正式出版的专著或者发表的论文较少。李志刚牧师对中国青年会也有深入的研究，从他在1994年第2卷的《维真学刊》上发表的《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人格救国”激起反响》一文，足见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中国青年会的独到见解。

美国学者对中国青年会历史的研究开始较早，成果也比较多。最早关心中国青年会历史的外国学者大概要数赖德烈，他撰写的《世界服务——北美青年会外国事业和世界服务的历史》（*World Service—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 M. C. A. of U. S. A. and Canada*），详细记述了青年会北美协会在海外的服务工作，其中第12章专门论述北美在中国（1895—1956）的服务。作者认为，中国青年会的迅速发展是在前25年，也就是1895年至1920年的这一时期。具体表现在：全国青年会的组织数量迅速增长，青年会会员的人数飞快上升，青年会的活动，如演讲、教育、体育和社会服务等蓬勃兴旺。20年代之后，青年会的发展出现下滑，但是仍然继续开展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等工作，并且投身抗日爱国运动之中。在作者看来，二十世纪上半期青年会的活动，似乎在向世俗的方向转变。作者对于青年会在中国的服务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与作者本人的新教徒身份不无关系，因为青年会的向外发展，是与新教徒的传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甘利特（Shirley S. Garret）是较早开始中国青年会历史的专门研究而且影响较大的海外学者，她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专著面世。《都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青年会1895—1926》一书（*Social Reformers in China—the Chinese Y. M. C. A. 1895—1926*）于197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探讨以改革者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基督教青年

<sup>3</sup> 查时杰，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一百七十年来的基督教》《台湾基督教史研究》

<sup>4</sup> 王成勉，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文社的盛衰——20年代基督教本色化之个案研究》

会，在近代中国城市中推行的各种社会改革方案及其效果，以进一步说明中西文化融汇的可能性和潜在的危险。作者认为，青年会是教育、卫生和福利计划的先锋，它所进行的改革是都市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动力。书中的观点的确很有见地，并且有大量的资料以为佐证。所以，该书正式发表之后，影响较大，不时被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参阅。30多年后的今天，作者的论点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鲁珍晞是另一名关注中国青年会历史的著名外国学者。早在一九八十年代她就有相关的著作问世，对1920至1928年的中国反对基督教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她在一九九〇年代撰写的“青年会—女青年会和中国对公民社会的探寻”(“The YMCA - YWCA and China's Search for a Civil Society”),载于《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市：宇宙光出版社，1994)一文，则是她对中国青年会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在此文中将8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学生运动与五四运动和青年会联系起来考察，重点阐述青年会在20年代的发展对尝试创建公民社会所做的贡献。文章指出，青年会领袖和社会福音派的其他中国基督徒一起，最初都是欢迎新文化运动的。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和新文化运动彼此互补，两者都造成科学和民主，并且鼓励青年献身于社会服务。后来因为青年会领袖坚持和平，反对革命，所以渐渐与反帝的民族主义相悖。作者还认为，青年会开展的文化活动，提供了许多的社区建设活动中心，而青年会的会所则成为有用的社区生活中心。作者的观点对于研究中国青年会的历史是很有启发的。但是，文章也有不足之处，一是没有给“公民社会”一个确切的界定，二是对青年会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分析不够，不利于充分说明青年会为创建公民社会所作出的贡献。

90年代以来，海外的部分中国留学生对中国青年会的历史也产生浓厚的兴趣，纷纷将研究目标指向中国青年会。例如，刑文军撰写的《社会福音、社会经济和青年会—甘博和普林斯顿—北京中心》(Social Gospel, Social Economics and the YMCA)，主要通过对北京青年会的外籍研究干事甘博的生活和工作之调查，探讨1906至1949年普林斯顿—北京中心的历史。在他看来，甘博和普林斯顿—北京中心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展现了西方和中国之间的知识和文化的普遍互动—美国和中国之间特殊的互动。作者与以前的研究之主要不同在于，从对中国青年会的宏观研究转向对其人物和组织的个案考察，由此拓宽和深化了这一研究领域，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让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对普林斯顿—北京中心在民国后期的活动介绍较少。

从美国学者对青年会历史的研究来看，主要存在几种倾向：其时间多集中在1920年代以前或者抗战以前；其内容多涉及青年会的社会福音和社会改革，强调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互动；对青年会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多持肯定评价。但是均忽略抗战以后的青年会历史，而且对地方青年会或者学校青年会的专门研究重视不够，重外籍干事轻华籍干事的倾向也较为明显。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情况来看，主要侧重宏观领域，多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



个整体加以研究，而对于微观方面的课题则重视不够，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青年会与工业改良、青年会与青年运动等。因此对青年会的深入研究有必要也有意义。一是可以拓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青年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中国的近代化和城市化与青年会的影响等等，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是有助于中国基督教史的深入研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基督教对华传教策略改变的产物，是在北美协会的直接协助下建立起来的，青年会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只有将中国基督教史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研究，才能够更加全面地再现历史。三是对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促进作用。中国的青年会是舶来品，它所传播和实践的社会福音是西方基督教神学之一，而非中国的本土文化。因此，青年会与中国社会的互动，既反映出不断变化的中外关系，也展现了东西两种文化的相遇、冲突和混合的过程。无疑，研究青年会的历史离不开对中外关系史的探讨，两者存在关联且相互促进。总之，充分利用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和回忆文章，探讨青年会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有利于了解近代中外关系的演变和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可以为今日世界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往提供某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探索适合今日中国国情的基督教发展道路，使宗教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基督教青年会对近现代教育的贡献作出研究探讨。笔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市档案馆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历史学、宗教学、教育学各方面进行客观系统的研究。本文将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置于整个社会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力求对青年会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贡献作出客观的评价。

由于笔者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掌握还有很多不足，相关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外籍干事的一些英文材料未能全部收集，因此对本文论题的探讨肯定存在着片面或者偏颇之处，敬祈各位老师不吝批评并赐教，以使笔者有机会继续学习，并对本文论题的研究作进一步的补充改善。

## 第一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沿革

### 第一节 追本溯源——基督教青年会的创立

基督教青年会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青年会 YMCA), 最初是由一位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 (George Williams, 1821—1905年) 于1844年在英国伦敦创立的。

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人口集中于都市, 都市生活造成青年人在心灵生活人的空虚与堕落。这种情形引起英国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人乔治·威廉的关注, 促使其创立基督教青年会。其初衷是“以高标准基督徒的性格陶冶绸布业和其他行业中青年的精神面貌”<sup>1</sup>, 目的是对青年人宣传宗教和开展一些正当的娱乐活动, 来改善青年们的精神生活。这个带有社会改良色彩的组织成立后, 立即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基督教教会的大力支持, 两年之内基督教青年会就在英国的一些重要的工业城市先后成立起来, 到1851年青年会在伦敦已有8处会所, 在英伦三岛一共发展了16个支会。1894年青年会举行50周年纪念的时候, 英国女王特授乔治·威廉勋爵称号。

1851年青年会从英国传到美国和加拿大, 这时青年会逐渐从一种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为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新教社会活动机构, 并建立起庞大的会所, 聘用专职的干事<sup>2</sup>。

青年会同时也传到了西欧和北欧各国。1855年欧美各国的青年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性会议, 组成“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World Alliance of the Y. M. C. A. S), 简称“世界协会”<sup>3</sup>, 并于1878年在瑞士的日内瓦正式成立了总部。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总部管理着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会, 拥有170多万会员。1889年美国 and 加拿大的青年会组成北美协会, 由美国人穆德长期担任负责人。

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和社会改良运动, 在客观上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 受到了欧美资产阶级的欢迎, 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支持并鼓励青年会积极向海外发展。1886年, 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举办了黑门山“大学生暑期圣经学校”中发起“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 鼓励学生到海外传教, 掀起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浪潮。在这场传教浪潮中, 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宣教对象。从1886年至1918年, 美国共派8000多名传教士到海外, 其中派往中国就有2500多名, 占总数的1/3; 许多著名的来

<sup>1</sup> 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13页

<sup>2</sup> 米会理:《青年会的过去与未来》, 载于《消息》, 1932年, 第50页

<sup>3</sup> 转引自陈秀萍编著:《沉浮录——中国音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第12页

华传教士，如司徒雷登、赖德烈、卜凯等人<sup>4</sup>都是通过这个运动派往中国。

1910年10月，美国总统塔夫脱为了讨论扩大基督教青年会在海外活动和募集捐款的方案，专门在白宫举行有二百多名大资本家和各洲青年会负责人出席的特别会议。塔夫脱在会议发表的演说中，竭力赞扬基督教青年会的功能可以促进基督教文明，明确表示了青年会的工作，与扩展美国在远东和世界是息息相关的。

“没有人想到，我们到中国去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侵略领土或干涉国家内政的野心的。但是，有些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能在他们本国的政府内占有重要的位置。我已经看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凡受过外国教育或其他因素影响的人，很容易获得重要的地位。通过这些人，我们就能够使这些落后国家最终地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sup>5</sup>

塔夫脱总统表示完全支持北美协会提出的在海外扩大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计划，要求到会人士，特别是金融界人士慷慨解囊。会议取得了成功，会后仅数月，就募得了二百万美元，比最初议定的目标超出了近一百万美元。

## 第二节 青年会在中国的缘起

中国最早的青年会，是学校青年会。1885年在福州的英华书院和北通州的潞河书院，就有美国传教士所发起组织的学校青年会，翌年，杭州长老会育英书院的青年会亦告成立。1890年，新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请求北美协会派员来华，就中国学生中训练青年工作人员事进行调查。1895年北美协会应邀派遣来会理牧师(D·Willard Lyon)到中国开展青年会活动。“鉴于天津毗邻京师，且为当时政府推行新教育之地”<sup>6</sup>，来会理牧师遂决定以天津为青年会的策源地。他陆续在天津五所官立学校里建立了“基督教学塾幼徒会”，徵求了五百多名学生会员。同年12月8日天津青年会正式成立，来会理也就成为青年会的第一任干事。1896年，北美协会干事兼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总干事穆德首次来华，当时国内只有五个学校有青年会组织。他由来会理牧师陪同出席了中国各地为学生及基督教工作人员举行的六个会议，遍访了中国各高等学校，宣传青年会的宗旨，使中国学生了解加入世界基督教学生团契的利益。经他的组织和推动，短短三个月中，就增加了22个新的学校青年会。在此基础上，穆德还将各地代表召集到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并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华基督教学塾青年会，推举来会理任总干事，并立即参加世界学盟为团体会员<sup>7</sup>。1898年，北美协会又陆续派

<sup>4</sup> 弗雷明：《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调查报告书》，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01页

<sup>5</sup> 余日章：《基督教青年会史略》，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发行，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编号U120-0-383，第48页

<sup>6</sup> 来会理：《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编号U120-0-64，第28页

<sup>7</sup> 来会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单行册)，1920年，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编号U120-0-63第22页

格林、路义思、巴乐满到中国,分别担任天津、上海和香港的青年会干事。1899年5月,青年会第二次全国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人,其中54人为中国人,代表了24所大学九个行省。1900年路义思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是乃为商界及职业界青年而设之第一个城市青年会”<sup>8</sup>。1901年11月,第三次全国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外代表共156人,其中中国代表131人。1902年5月,在上海举行了基督教青年会第四次全国大会,成立了“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会议决定开展对知识界和非教会学校的学生工作,同时还成立书报部,把《学塾月刊》改名为《学生青年报》,出版青年读物。

### 第三节 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

从1902年城市青年会正式加入全国组织至1912年青年会得到北京政府的正式承认,共十年间为青年会的初步发展时期,当时国内政治方面发生了若干重大的变故。(1)1904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和俄国的战败告终,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士认为,日俄战争的实质是,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击败了君主专制的俄国。“立宪”二字在当时上层缙绅的心目中忽然放大了,这种认识导致了后来的立宪运动的发轫。(2)1905年,清廷下诏废科举、设学堂,中国千余年来传统的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一时期,大批学生出洋留学,尤其到日本的留学生人数激增。据学部统计,到1909年,新式学堂为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八所,学生有一百五十六万零二百七十人;1905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人数达到八千人<sup>10</sup>。新式学生的出现和众多八股人士的淘汰,直接和间接地牵动了整个社会。新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旧的教育基础,清末新政造就了他们,但他们又超出了新政划出的界限,奔向立宪和革命。(3)1911年武昌起义,举国响应,推倒清朝政府,建立共和政府,历史在维新、革命、民变和清朝的自我挽救之间,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青年会处此时代的剧变之中,努力维持生存,并寻求各种机会发展。

中国最早的运动会于1902年在上海和天津举行,均由青年会发起组织,“虽所比赛者甚觉幼稚,而初次试办已为大众所赞成注意”<sup>11</sup>。到1910年,青年会以举行全国性运动会的时机已成熟,特派遣爱克斯纳到南京筹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被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本时期之初,青年会已开始创办日夜学校,最早者为上海青年会。自此,日夜学校成为全国青年会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1904年,青年会在苏州东吴大学举办第一个学生夏令会,名曰“江南学生夏令会”。同年在

<sup>8</sup> 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页

<sup>9</sup> 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93页

<sup>10</sup>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sup>11</sup> 傅若愚讲授、袁磊整理:《青年会历史概述》,1949年,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编号U120-0-64,第55页

山东青岛举办“山东学生夏令会”，此后每年各地均有学生夏令会的举行。这一时期学校青年会“数目激增，推其缘故，实由夏令会激扬导利之功也”<sup>12</sup>。

1906年，由于大批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青年会总委办为了到这些中国留学生中间开展活动，在东京成立了“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任命王正廷为干事。1909年随着留美学生的增加，又组成了“中华基督教留美青年会”，仍任命王正廷为干事。

1911年总委办成立讲演部，由饶柏森(C. H. Robertson)博士主领。该部设立之宗旨“欲以大规模之讲演计划，博得全国政商学界对于青年会之信仰，籍是为青年会开辟新径，俾能顺利进行焉”。1910年学生立志证道团组织成立，第一任总干事为丁立美牧师，1912年该团正式加入青年会。

1910年穆德募集到大批捐款后，即确定上海为基督教青年会全国中心。1912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全国会议，议决将总部名称定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正式承认；把朝鲜分出去单独成立青年会，推举巴乐满为第一任全国协会的总干事。到1912年，全国有市会25处，会员11300余人；校会105处，会员3876人；外籍干事87人，国籍干事95人<sup>13</sup>。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在总结此一时期青年会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兴办新式学校，造就出具有现代眼光并得到新式训练的青年，他们的人数日有增加，……这些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发现有许多新的社会机关需要他们去服务，主要的如铁路、洋行、电报、学校等都是，为要联合一班新青年来组织团契，和实现共同的理想”。因此，“青年会的第二期发展，是势所必然的”<sup>14</sup>。

1912年至1922年为青年会事工迅速发展的时期。本期自1912年共和政府成立及青年会正式获得政府承认起至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召开及非基督教运动爆发止，前后十年。

1915年起为适应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改由中国人担任。第一位中国籍总干事是王正廷，一年后因其转到外交界任职而由余日章代理。1917年余日章正式就任总干事，一直连任到1935年，青年会的工作在其领导下日趋成熟。青年会原先的宗旨，就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余日章在此基础上，更提出了“人格救国”<sup>15</sup>的号召。这个号召虽然是基督教精神的一种逻辑的伸展，然而也非常切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作出的种种自救的努力，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义和团、清末新政，乃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似乎都没有使中国从根本上脱离原先的窘境。因

<sup>12</sup> 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载于《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98页

<sup>13</sup> 范子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各处之成绩》，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2年

<sup>14</sup>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sup>15</sup> 李志刚著：《基督教青年会提倡“人格救国”及其反响》，载于《维真学刊》，1994年第1期，第66页

此, 1911 年以后, 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先前所有变革, 都是外在和表面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本身的改变, 是中国民族和个人道德上和心理上的变革。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就代表了这种心理建设的努力。社会上新文化运动中对人本身变革的呼声, 也反映到教会中来, 同在 1915 年, 王正廷即指出, 社会腐败和国家积弱的原因, 在“人心日益浇漓”, “德育日益堕落”, 因为“一国人心向善则国强, 反是则危”。余日章的“人格救国”论, 也是这种意见的表现。余氏经常谈论中国今日之需要, 并不在于海陆军, 也不在于兴办实业, 而在于人民的道德的变革, 故道德是“需要之需要”<sup>16</sup>。

这一时期世界的形势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大多数非基督教国家都发生经济和政治的变革, 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正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潮流, 并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青年会在这时的中国能获得发展, 是与它提倡的“社会福音”思想有关的<sup>17</sup>。“社会福音”是当时美国流行的一种神学思想。它认为宗教不仅应该注重个人灵性的培养, 而且它有社会的内容。从 1912 年至 1913 年, 青年会特别邀请美国布道家艾迪, 来北京和各地举行布道大会。艾迪在很多场合宣传美国“社会福音”神学家饶兴伯的思想, 他对中国青年说“我们的事业不单单在乎赢得或改变个人, 而是在乎使整个的生活灵性化。”艾迪的思想, 对那个时代的青年产生过很大影响。

在这种趋势之下, 青年会做了相当多的社会工作, 大多数市会都开设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和教授语言及职业技术的夜校。贡献最大的是首创平民教育事业<sup>18</sup>, 即民众教育, 由晏阳初先生兴起, 开设平民千字课, 使不识字的平民在短时期内可以识字读书, 并由青年会推行于全国。本时期中讲演部的工作已发展为科学、教育、卫生、造林、水利及影图教育六部。全国协会书报部又于此时期内积极进行文字事业计划, 包括定期刊物、研经课本及其他传扬基督教的书籍。1913 年“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共同成立了远东运动机构, 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一界远东运动会, 训练参赛选手及会务筹备均由各地的青年会主办。青年会还在很多地方推行卫生运动, 提倡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 并邀集其他基督教团体, 组织“中华基督教卫生教育会”。

1922 年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黄金时期”, 当时全国已有市会 40 处, 会员有 53800 多人; 校会有 200 处, 会员有 24100 多人。外籍干事有 95 人, 中国籍干事有 87 人<sup>19</sup>。

### 第四节 青年会的衰落与复兴

1922 至 1927 年, 中国社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 运动的直接起因是 1922

<sup>16</sup> 李志刚著:《基督教青年会提倡“人格救国”及其反响》, 载于《维真学刊》, 1994 年第 1 期, 第 66 页

<sup>17</sup> 吴耀宗:《社会福音》, 青年协会书局, 1934 年, 第 89 页

<sup>18</sup> 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 载于《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 第 100 页

<sup>19</sup> 《基督教青年会纪略》载于《中华基督教年鉴》, 1914 年

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大会。3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代表及中国方面的500多人云集清华，讨论“如何宣传基督教与现代学生”，“学校生活如何基督化”、“现代学生在教会中的责任”等问题。当时的中国学界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正在广泛的领域内进行反帝爱国行动，大会的召开强化了当时开始在知识界流行的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观点，激起了中国社会的反对浪潮。由于非基督教运动具有明确的反帝诉求，它的出现在当时的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这场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从1922到1929年，是青年会遭遇困难挫折的时期。

各地城市青年会在这一时期遭受到巨大损失。(1)经济来源大大减少。1922年全国市会的收入总额为976,041元，到1927年只有527,121元，减少约46%。(2)会员人数骤降。1927年全国市会会员总数仅有19,767人较诸1922年的53,812人，减少了63%。(3)市会各部的活动也相应减少。如果以1920年为100%，到1927年参加青年会宗教活动的人数只有30%，参加青年会演讲会听讲的只有42%，参加青年会日校学生人数只有46%，参加青年会体育班的人数只有20%<sup>20</sup>。

就教会而言，因多数教会学校停办，以及各公私立学校内其他学生团体的兴起，学校青年会几乎减少一半，活动范围也大为缩小。

形势固然十分严峻，青年会仍然能应时势之需求开展一些新的事业。最显著的是开展公民教育运动，由全国协会延聘教育名家，编著公民教育书籍，并于各地提倡短期公民教育运动，组织研究班等，向公民传授知识。另一重要的新事业为提倡劳资合作，并在劳工中开展社会改良的实验。如1922年上海青年会在浦东设立了劳工新村，以后社会改良的活动又从城市移到了乡村，1928年苏州青年会在唯亭山举办了一个“农村服务实验场”<sup>21</sup>。

1929年10月在杭州举行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可视为衰落时期的结束。此时青年会“虽未恢复其所损失，然已确实证明其能制胜时代之试验，安渡险恶之旅程矣”<sup>22</sup>。

1929—1935年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事业的复兴时期，此时期青年会在会员，经济与事业上逐渐恢复到以往鼎盛时期的状况。本时期内反基运动再也没发现，学生界对于宗教的态度也发生转变。社会上对于青年会的赞助与支持也大为改善，表现为各市会所在招募会员与赞助时取得显著喜人的成绩。

在复兴时期的开始阶段，中国国民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人心迷乱，青年会必须根据新教育原理，重新研究其地位，使命及工作程序。此活动开始于1930年的简要调查。此外全国协会在本时期内，又于各地召集干事及义务领袖，举行多次会务会议，对于一般青年的需要，当地所有的资源的问题，从个人工作，团体事业，群众事业设备事业等四项分别作详细的探讨。青年会干事在本质上是作为一项专门职业，青年会想要在事业

<sup>20</sup> 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页

<sup>21</sup> 朱贤澄：《青年会与劳工新村运动》，载于《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65页

<sup>22</sup> 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载于《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03页

事务上进一步提升效能就必须干事久居其位，然而当时中国因政界与商界都急需人才，又因为一般市会的经济基础未臻稳固，以至于干事更动频繁。为了谋求补救此种缺憾，在此复兴时期内重新致力于干事人才的征求与训练<sup>23</sup>。于1931年，1934两年，先后办理全国干事暑期学校。再则此时期以前所有的训练事业多为在职干事的训练，从1930年后，开始进行职前训练，每年征有志从事青年会事业的大学毕业生数名，在青年会特科进行一年实习，然后介绍给各个市会以备聘用。

此时期中，中国青年会为应付紧急需要，曾进行数种特殊工作：

1、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空前水灾，青年会调集人才参加政府组织的水灾救济委员会，办理紧急赈灾工作。

2、1932年，上海战事发生，青年会联络上海基督教团体，组织基督教救济战地难民委员会，并供给人才及设备，办理救济难民的工作<sup>24</sup>。

3、1933年华北战役，青年会组织全国战地服务委员会。

针对当时青年会学生事业上的种种问题，如几年内多数经过教会学校停办，以至校会数目锐减，而学校的环境较前有重大变故等。在十二届全国大会中，议定切实的方案，深得学生代表的赞助而通过，方案中包括校会的宗旨，目标，与组织，市会学生事业的方针，对于整个学生运动的联络与协助，及各个教会保持密切合作等等。这些方案的确定一方面使青年会与学生团体的关系更臻丰富。另一方面也使基督教学生事业的开展更加顺利。

第十二次全国大会关于青年会与宗教，制定了“青年与宗教运动”的两年计划。第一年，特请美国艾迪博士于1934年秋季来华，在二十二处城市，向知识界青年宣扬基督教，效果极为良好。第二年的计划主要为请少数中国信徒领袖组织巡回工作团，赴国内重要城市，进行基督教的运动。

全国协会于1934年初拟定三年事业计划，准备于三年内出版关于宗教及社会问题的名著52种，其他丛书小册多种，以供当代青年阅读，第一年出版的数量已超过预计<sup>25</sup>。

此时期中，对于少年营事业颇为注重，青岛燕儿岛的少年营址于1931年落成。1933年夏，在该处举行少年营总指导学校，以训练少年营领袖人才，并出版《少年营》一书，详细记载少年营的原理及技术，1934年，各市会所举办少年营共计十处。

在此时期，青年会参加世界青年协会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会议多次，中国青年会与他国青年运动联络频繁，时有信徒往返，对于增进民族间的友谊亦有远人的效果。

总而言之，此一时期，确实表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由渐复兴，青年会经此数年的努力，“已经能顺应环境，应付一切困难，同时认识其使命，增强其组织，准备对国家社会环境尽更大的服务”<sup>26</sup>。

<sup>23</sup> 李公朴：《青年会复兴的途径》，载于《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9页

<sup>24</sup> 应远涛：《青年会对于赈灾之贡献》，载于《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28页

<sup>25</sup> 范子美：《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载于《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34页

<sup>26</sup> 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载于《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05页



## 第五节 青年会在华发展和衰落的原因

与其它基督教团体相较之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无论在成立时间上或组织人数上都是居于劣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晚至 1895 年才正式在华创立,而且当时只有一位西干事负责会务。然而,它在创立十七年后,设立了 130 处的分会,总会员人数也达到一万人。在当时政治纷扰不安,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该会此种迅速的拓展印证它成功地成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所接受,并获得广大的回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后来成功的拓展实在是奠定于它早期的发展,而它早期的顺利发展则是由于清末有利于其发展的外环境以及它本身的组织文化使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甲午战败的刺激。中国青年会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 1885 年。但是,北美协会正式派遣干事来华,并且帮助中国建立青年会是在 1895 年。这一年正是中国败于日本、被迫于之签订《马关条约》之时。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因此,积极学习西方,为中国的强盛而努力求索,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一致心愿。青年会在传播基督教诉同时,也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这自然能够吸引不少的中国青年。

(二) 民国初期的分裂。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是 1912 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但是共和国不过是昙花一现,民主共和国很快遭到军阀的践踏。袁世凯的复辟梦破灭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和政权的频繁更迭。置身乱世之中的中国青年会,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为了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并且争取中国青年学生的拥护,各派政治势力对青年会均表现出兴趣甚浓和热情有加,当朝统治者也极力提供帮助,使青年会的活动能够顺利开展。而战乱给下层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也为青年会服务民众和改造社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三) 科举制度的废除。创始于隋代,一直绵延到清末的中国科举制度,前后延续达 1300 年之久。到了清末,科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废除科举势在必行。然而,科举制度在 1905 年的消失,又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前的“士”或者“士大夫”)带来莫大的冲击。传统的仕途中断,社会地位由中心移向边缘,使知识分子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一时难以适应。青年会开展的四育活动,不仅为城市青年提供了排遣郁闷和空虚的精神文化,而且为有志之士创造了参与改造社会、实践救国理想的机会;青年会开办的专门学校,使年轻人在城市社会转型—由封建城市向近代化城市的转变一时期,能够迅速掌握实用的技能与知识,利于其在近代城市的生存与立足。

要说明中国青年会在 20 年代的迅速发展,仅仅考虑中国方面的因素是不够的,因为青年会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播下的种子,因此,美国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有:

(一) 是大资本家对青年会提供了很大的财力支持,根据赖德烈的研究可知,以大笔

款项资助青年会的人物有：洛克菲勒 (Lockefeller) 父子、哈克尼斯 (E. S. Harkness)、麦克科密克斯 (McCormicks)、海德 (A. A. Hyde)、胡福 (W. H. Hoover)、万那迈克 (J. Wanamaker) 等人。他们有的就捐出 5 万美金，这就使青年会的事业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二) 是青年会采用了适当而有效的传教策略。同传统的以教堂布道为主的传教方式不同，青年会主要是通过电影、幻灯等现代声光技术、体育活动和社会服务等吸引青年，使后者因受基督精神的感化而自愿信教。这种将宗教宣传与改造个人和改造社会相结合的形式，曾经受到许多青年学生的欢迎。

(三) 是社会福音与此一时期的中国社会需要具有某种一致性，例如，社会福音希望改善社会，倡导社会正义，反对战争，主张和平，谴责资本主义以强凌弱，这对于力求摆脱列强控制、渴望和平强盛和社会有序发展的中国来说，一度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中国青年会在二十世纪初二十多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之后开始下滑。为了复兴青年会的事业，干事们进行了种种的尝试和努力，但是都难以再创昔日的辉煌。“上帝国”始终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也没有基督教化，在中国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基督教。因此，探讨青年会的失败原因，专家学者的兴趣似乎更大。在详细的分析之后，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赖德烈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日本的侵略、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共产主义的竞争是主要原因。甘利特分析说，青年会在争取中国中产阶级的同时，忽略了学生，致使学生被中国共产党争取过去；而青年会依靠的中产阶级，又正是中国劳工挑战的目标，这使青年会无法扩大依靠对象；加上青年会的中立立场和共产主义的竞争，所有这些导致了青年会的失败。鲁珍啼更强调原因在于青年会干事的中立立场，指出青年会干事坚定的和平主义与反帝的民族主义越来越不协调。还有学者指出，青年会拥护和实践的社会福音自身存在矛盾，使青年会逐渐陷于不利。

不可否认，上述各种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促成了青年会的失败。但是，笔者认为有几点是必须强调的。首先，在众多的原因中，应该有主次之分。其次，分析中国青年会的失败，不应该脱离其社会处境，中国、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形势变化都应考虑在内。再有，正如青年会的兴盛与社会福音有直接关系一样，青年会的失败同样与社会福音分不开。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 青年会与其依靠对象。与英美两国的青年会不同，中国的青年会不是本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产物，而是从美国直接传入的。近代中国虽然也出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只是初级阶段而已，而且她并未经过工业革命，是列强的入侵迫使她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因此，青年会依靠的对象——中产阶级和学生——在中国只占很小的比例，青年会的社会基础并不广泛。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青年会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曾经尝试向乡村发展，但是收效甚微。原因在于，青年会本身是一个服务城市的组织，缺少农村工作的经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不能为中国农民解决最为急需的土地问题，因此很难争取到农民的真正拥护。

(二) 社会福音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美国在十八世纪中期(1776)已经实现独立,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中国迟至1912年才将帝制推翻,并代之以中华民国。但这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因为她没有取得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统一和建立民权,也就是说,她并没有真正解决民族国家应该解决的问题。她仍然处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之中上,但是却又被西方国家强行纳入了国际世界秩序,既无产权,也无国际地位。因此,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停止为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奋斗。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以来,由青年会推动的社会福音运动在中国的开展,一时间的确是迎合了中国知识分子思变图强的心理,受到中国青年的欢迎,使青年会出现了从未有发展态势。但是必须看到,青年会毕竟只能对中国社会作部分改良,社会福音将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基督教会,反对一切暴力,反对所有战争,企图以基督教的爱之精神感化邪恶,以实现世界大同和天下一家等等主张,既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可能彻底消除中华民族的危机,甚至还被看成是破坏中国青年的民族觉悟和爱国心,因而遭到民族主义运动的激烈抨击和反对。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救国心切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多方探索,在传入国内的众多主义与信仰之中不断地选择,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选择。谁能够促进或者推动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谁就是赢家。中国人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三) 经济危机和宗教危机。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带给资本主义世界前所未有的破坏,有学者指出,危机造成的物质损失不亚于1914至1928年的世界大战。日本和美国因此受到的打击都是巨大的,为摆脱危机,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办法。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的青年会以极大的破坏。而美国因经济而产生和加深的宗教危机,同时使中国的青年会遭遇严重困难。米勒(R. M. Miller)指出:毫无疑问,三十年代确实是美国教会和整个社会非常艰难的时期。教会人员减少,预算削减,牧师被辞,教堂关闭。其后,传教士的热情下降,对传教的兴趣减少,传教士队伍受到削弱,北美协会不得不大量减少对中国青年会的人员帮助和财政资助。外籍干事的人数越来越少。1921年外籍干事有107人,1928年减少到45人,到1930年则只有32人。甚至有的城市或地区的青年会已经没有外籍干事领导。

毫无疑问,青年会在中国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去考虑。中国的青年会是舶来品,它所传播和实践的社会福音也是西方基督教神学之一,而非中国的本土文化。因此,中国人对它的取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一个社会的需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处境的变化而不同。近代中国社会以多变为其特征,晚清以来尤其如此。世界形势的变化、西方的影响、中国自身力量的作用等等,导致了中国的多变。对于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处境,青年会的应因能力不是无限的,社会福音也不是万灵药。一种外来文化不能使其所欲影响的社会及其成员感受到它的价值,自然缺少吸引力,因而难以避免被疏离的命运。

## 第二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平民教育

在中国最早提倡并发起平民教育的是青年会。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掀起平民教育运动的活动中，青年会起了重要的作用。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愚昧落后的社会现实，使得早在本世纪初年，就有人意识到并提出对成人文盲和穷人进行教育的主张，清末立宪运动期间以及袁世凯统治时期就有政府和民间人士对此作过尝试。但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内战连年，各派军阀走马灯似的控制中央政权，使得若大的中国失去了具有权威的中央政权，政府推行平民教育已因内战及资金成为泡影，民间起而承担这一任务便成为可能——中央政府权威衰弱，为平民教育提供了较为自由宽松的客观条件，这是平民教育运动以民办形式产生发展的一大社会背景。

“五四”以来高涨的政治气氛，使人们再次迫切地感到，要改变中国社会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落后、思想闭塞的状况，就必须转变观念，彻底改造社会。而对于如何改造社会这一问题，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不同，各人的生活环境不同，因而出现了许多改造方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推翻现政府，打倒帝国主义以求根本改造，为此目标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倾向于利用现时政府的力量，以政府实行的点滴改良来改造社会；更有一部分人如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主张不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调查、研究推行平民教育，以教育的力量推动社会改造。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广大民众特别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觉悟的基础上，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走向人民大众，教育和发动他们，中国的社会改造方有希望<sup>27</sup>。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开新文学风气之先，通俗易懂的文件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也为平民教育运动提供了便利。

### 第一节 “人格救国”

“人格救国”一词，起始于余日章在 1921 年 4 月 12 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新会所落成之时，为纪念册封面的题字<sup>28</sup>。在 1923 年 10 月 16 日至 21 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广州岭南大学召开第九次全国大会，是以“人格救国”作为大会主题，

<sup>27</sup> 陈有铨：《躁动的百年：20 世纪的教育历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28 页

<sup>28</sup> 《人格救国》，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编号 U-120-0-2，第 2 页

全国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在《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诸同志书》有言：“诸君为我国青年及幼童谋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养成其完全人格，上以荣耀上帝之圣名，推广其天国，下奠民国之基础，发扬其光辉，不辞劳瘁，踊跃前往广州赴第九次全国大会，以‘人格救国’为总题，以诸君之热忱毅力，将来大会成绩优美，可操胜券。”又云：“然章以个人观察所及，兼受种种之激励，不能不确认人格为救国唯一根本，因此决用人格救国四字以唤醒四万万同胞。而社会各界对此旨题，近亦普遍之觉悟，其为直接间接之宣传。然而收效甚寡者，其故何耶？此中原因甚复杂，其最重要者，即明知人格能救国，而对于毁坏人格者未尝除去，对于培养人格者又未有具体之设施。然非人格之不能救国，实因尚未有人格之建立，因而国亦无从赖以得救也。第九次全国大会既以‘人格救国’为号召，吾知诸君非仅承认、赞成、提倡人格为救国唯一利器，且于维护人格培养人格之两大端，尤当三致意焉。”

由此可知“人格救国”运动是青年会全国协会在1923年10月16日第九次全国大会才开始推展，整个观念是由余日章提倡和策动。青年会有关完全人格的培养，早年有视之为德育部的工作，如范子美所撰《德育之部——现代青年之人格》，指出人格与神、物的关系，人类位于神性和物性中间，人性即人格是从神创造而出，与神性物性合而为一。人格即有对于世界之人格；对于国家之人格；对于社会之人格；对于家庭之人格；对于自己之人格等伦理秩序<sup>29</sup>。所以中国青年会在未推行“人格救国”主张之前，所强调的完全人格，实在是一种道德训练。“人格”本是道德的概念，而被使用于人格救国的政治目的，完全是出于余日章爱国的构思。因为自有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以致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中国外交日见失利，国内知识分子提出不少救国的主张，余日章于1921年参加华盛顿会议，尤体会中国局势的险峻，救国思想更为逼切，因此才有“人格救国”理念的主张，并借全国青年会的力量加以推广。余日章在《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诸同志书》中，深信基督教青年会既有维护培养人格的能力，实足可以从人格达成救国的目的。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分为九组，每组讨论主题实为青年会当前的争务。第七组开宗明议讨论青年会智育事业的目的，建议一有谓：“青年会智育事业之宗旨，在对青年培养基督化的人格，并授以适当之知识及技能，以适应社会的需要。”<sup>30</sup>认为智育部干事与学校教员必须在日校及夜校授以圣经科；每星期举行多次宗教演讲。每日清晨守晨更；进餐必先谢祷；星期日必赴礼拜堂。如此训练青年幼童，实有助达成基督化人格的目的。综合各组意见，“人格救国”的实施多偏重于人格的培育，少论救国的重要，而且将人格培育训练视为智育部的工作。为配合“人格救国”的推行，《青年进步》季刊在1923年10月第66册，有《人格问题》专论的发表。自始以来，青年会先后推行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两项重大的事工。

<sup>29</sup> 转引自李志刚著：《基督教青年会提倡“人格救国”及其反响》，《维真学刊》1994年第2期，第77页

<sup>30</sup>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第九次全国大会书》，1923年，第67页

## 第二节 以城市为中心的识字教育阶段

### 一、平民教育的缘起

中国的“平民教育”概念和现象，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华工队伍。当时因为参战的关系，中国先后约有二十万劳工到欧洲战地去做工。这些华工在欧洲，远离家乡，人地生疏，行动常常感觉不便，又因未曾受过什么教育，精神上也常感痛苦，“时会做出有伤国体的事情来”<sup>31</sup>。北美青年会有鉴于此，特发起组织华工青年会以资补救，当时招募我国留学生赴欧洲战地为华工服务，前后应征去服务者为五十余人，晏阳初和傅若愚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在战地服务华工的留学生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帮助华工写信、汇款、翻译、讲解新闻等，但晏阳初他们很快发现了教华工识字，让他们自己解决有关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便为他们开办识字班。华工学习热情之高、教学效果之好使晏阳初和其他干事深受鼓舞。晏阳初接着把这一活动推广到他直接服务的战区以外，并在巴黎编辑出版《华工周报》和通俗新知识课本，作为原来识字和刚扫盲华工的继续教育读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华工扫盲教育相当成功，据估计华工初到法国时，识字者仅居 20%左右，到 1920 年底，这一比例增至 38%左右。这些青年会干事也积累了经验，且立志将来回国提倡这种教育。这可说是我国最早的平民教育。但这种平民教育却首先不是产生于国内，而是产生于在国外的华工之中，而且作为其最早的负责人之一的晏阳初是以留学生身份由北美青年会派往法国巴黎的。

### 二、平民教育在城市的开展

1920 年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晏阳初即束装回国。时值“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首次提上国民的议事日程。国民教育开始引起国人的注意，但其施教对象仅限儿童，属慈善性质的。以一般劳动群众为对象的平民教育虽也有人倡导，但实际的推动却不够有力，不够普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认为中国民主之不彰，在于文盲之比例太高。由于国民多数不能读写，不具备现代国民之基本知识，即不会察觉作为公民之权利与责任，也就不会去注意国家之福利。晏阳初遂在余日章的支持下，在青年会下创设“平民教育部”，以“用科学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以实用为目标编写教材，进行教学”为方针，着手平民教育之筹划<sup>32</sup>。青年会开展平民教育之初第一件事即是着手编撰课本，结果就是后来通行全国的四册平民《千字课》。

<sup>31</sup> 应远涛：《青年会对于军队及战区之服务》，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72页

<sup>32</sup>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使命》，载于《晏阳初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第28页

由于当时国内没有任何类似的“千字课”的存在，因此课本中的选字与取材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实验才决定下来。选字时尽量搜集民众日用的文件以及中国白话文的书刊，如小说、戏剧、民歌、账簿、文契、告示甚至街名、商店、招牌……等。青年会前后动员50余人，一共搜集了150万字的材料。后即统计各个字出现的次数，以发现次数多的字，选为常用字。并将选字结果与当时有关文献相互参证，最后选定最常用的1000多字，用来编写教材，这才编成了《平民千字课》。这四册《千字课》可说是青年会进行平民教育最早的工具<sup>33</sup>。

平民教育运动开始的第一步是大规模的平民识字运动，运动持续的时间大约有两三年。共选了四个地点进行这项运动。第一个大运动在长沙举行，由当地青年会发起，联合全城各界人士共同进行。第一件事是分别拜访各界领袖、社会贤达，说明来意，请求赞助。当时的湖南省长为赵恒惕，他慨捐1000元作为赞助，各方群起响应，解囊相助。其次是扩大宣传，发动全城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游行宣传，张贴宣传图画，散发说明传单，意在使识字的与不识字的一齐觉醒。最后是去请教师，计共需教师150人，乃召开了一个全城中小学教师会议，请求协助。当时雅礼大学的学生也愿合作。这些问题解决后，50多处的平民教育班，就一齐办起来了。当时招的一千四百多学生都是目不识丁者，年龄最小的十一岁，最老的四十二岁，各种职业的人都有，分为五十个平民学校教授。他们每晚到校读书，学习非常用功，四个月功夫便把四册千字课读完，考试及格毕业者有九百六十七人。第二个大运动地点是在烟台，也是由青年会发起，办法和长沙大致相同，不过规模较大。长沙那次只有男生而烟台却男女生都有，共计男女学生一千八百人。四个月考试及格毕业者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之多。第三个运动在杭州，也是由当地青年会发起，联合全城各界一致进行的。杭州大运动进行之时，颇得当地官员的帮忙，譬如招生一事，即全由警察负责。当时共招收了学生两千人，分八十所平民学校授课，四个月后竟有一千四百三十四人考试及格毕业，成绩也算可以。经过这三个成绩斐然的运动，平民教育就顺利地度过了试验时期，并进入了推行时期<sup>34</sup>。

由于青年会平民教育试验的成功，消息传出去，引起了当时国内一般教育家的注意，其中如陶行知、朱经农、黄任之、胡适之、朱其慧诸人，曾各自就近到长沙、烟台、杭州等处去参观过，目观情形深受感动，都说这种运动有推广全国的必要。但也感到工程浩大，要达到目的必须另组一专门独立机关来办理不可。于是，经过筹划，组织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设会所于北平，推选朱其慧女士为会长，聘晏阳初先生为总干事，继而各地各省纷纷设立分会，平民教育事业一时如风起云涌，转瞬之间推广到全国各地，这是平民教育历史上最可欣喜的一页。

<sup>33</sup> 傅若愚：《青年会对于平民教育之贡献》，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44页

<sup>34</sup> 傅若愚：《青年会对于平民教育之贡献》，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45页

接下来的十余年中各地青年会纷纷举行大规模的识字运动，所涉及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汉口、南昌、苏州、宁波、北平、济南、天津、太原、开封、郑州、重庆、成都、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大连、沈阳、哈尔滨等二十一处，而最初举办的长沙、烟台、杭州三处尚不算在内。而单以汉口一地为例，一年之内在平民教育项目下毕业之学生，即达四千八百人之多。这是到1926年为止，青年会单年一地“平民教育”毕业人数之最高记录。这些都是大规模的运动，而小规模之提倡如设立平民学校一二所至三五所，那全国二百多个青年会，连同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在内，几乎无处不有。论到成绩，市会方面的平民教育事业办理最久的要算烟台、长沙、宁波、苏州等处。规模最大的要算南京、上海、汉口、成都、沈阳、广州、杭州等处，提倡最有力者要算重庆、济南、南昌、大连、哈尔滨等处。至于学校青年会方面，如广州的岭南、培正，苏州的东吴，杭州的江惠兰，嘉兴的秀州，天津的南开，通州的潞河，福州的协和和英华，北平的清华、燕京等校。虽然没有详细的数字来统计多少人受益于青年会的平民教育，但是到1926年为止，青年会所编辑的千字课文和各种平民教育书籍已销去八十余万册，可见当时青年会在这方面的影响之大。在1935年时曾表示青年会所教过的平民学生人数当在25万人左右<sup>35</sup>。

### 三、平民教育的内容

平民教育的内容涉及面很广，“识字教育不过是平民教育的初步而已，倘然识字教育以外，再没有别的教育……平民教育亦够不上‘教育’二字”<sup>36</sup>，因此除了教授千字课，平民教育还包括以下的继续教育。

一、平民高级学校——平民学校分为初、高两级，初级注重识字，以千字课为主，高级注重常识，以历史地理算法书信卫生等为课程。平民学生读完千字课后再受四个月的高级教育，则可大略具备了基本常识。

二、平民图书馆——平民图书馆内提供一切关于平民的读物随意供人借阅。这种图书馆和普通报室相同，设备很简单，开放有定时。

三、平民同学会——同学会是继续教育的一种重要设施，它虽由学生自动组织但仍有教员参加在内任顾问。同学会的宗旨在联络感情，研求学问，和服务社会三项。凡是平民学校的毕业生都有加入同学会的义务。

四、平民讲习会——这种讲习会是专为平民学校毕业生或其他相等程度的人办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的知识和技术。它开会或每星期一次或每月一次，或数月一次，视各地情形及需要而定。

职业补习学校也是平民教育的一种形式。它招收的是多少认点儿字、读过书的有点

<sup>35</sup> 同上，第47页

<sup>36</sup>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9页



文化基础的有职业或无职业的成年人，授以从事某种工业、商业、农业生产的知识技能，并相应的提高其普通文化水平，以为他们搞好本身所从事的职业或开辟就业门路创造条件。

平民教育运动还十分重视妇女教育，“没有一个富强国家的妇女是不受教育的”。中国有二万万妇女同胞，如果忽视对她们的教育工作，“中国民众纵然站了起来，也是独脚者”。从1928年起，平教会与各地青年会就组织妇女教育研究委员会，开始了乡村妇女教育研究，先后开办妇女平民学校，妇女育才学校、青年初习学校，为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创造机会<sup>37</sup>。

青年会提倡平民教育不但注重平民学校及其他教育设施，更致力于平民教育书籍的编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青年会所出版的平民教育书籍最早的为平民千字课，共四册，编撰人晏阳初与傅若愚，为后来千字课的鼻祖。其次是高级课本，共六册，即平民历史，平民地理，平民算法，平民书信，平民卫生和平民常识。再其次为平民教育小丛书，包括平民学校简要办法，千字课教案举例，幻灯教授法，假期推行平民教育计划，平民教育实施法等。这些书籍自从出版以来颇受社会欢迎，各地采用购买的很多。

### 第三节 以农村为中心的“四大教育”阶段

在20年代初以城市为重点的平民教育活动中，晏阳初与其同事的认识逐渐有所深化。他们认识到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为此，平民教育运动由以城市为重点转向了以农村为重点。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与试验，晏阳初等对中国社会问题与平民教育的性质和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基本的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这就是：愚、穷、弱、私。因此，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转向农村，并确定平民教育的四大内容：“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希望中国人，人人都是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sup>38</sup>1929年平教总会迁往河北定县，开始定县实验，表明平民教育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农村为中心的四大教育阶段。

文艺教育包括文字教育和艺术教育两大内容，使农民不仅能够识字，而且接受图画、音乐、无线电和戏剧教育，促进农民的文化生活，使他们对于自然环境有相当的欣赏与了解，从而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为了向农民传授和普及科学知识，基督教青年会尽一切可能，把平民科学教育融入平民文学之中。青年会和平教会采集定县民间

<sup>37</sup> 转引自转引自陈秀萍编著：《沉浮录——中国青年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sup>38</sup>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

最流行的一种戏曲——秧歌，并出版《定县秧歌选》，深受人们欢迎。此外，青年会编辑的课本有千字课三种（市民、农民、士兵）；自修用本三种；文艺课本两种（市民高级文艺课本、农民高级文艺课本）。并在教材中贯彻科学精神，平民读物的内容 70%为常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各占三分之一。1930 年起，青年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在定县进行无线电广播的教育实验，这在中国农村是最早的。广播内容有四大教育方面的稿件，农民日用常识、科学小常识等，通俗易懂，切合农村实际，农民很感兴趣，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青年会还从美国购置电影器材，运用电影对农民进行教育。不仅用它作为向平民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手段，而且要将它作为培训社会和经济改造的几个主要领域所需技术人员的手段。

生计教育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二是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增加生产的利益。青年会在定县设立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开展农民生计训练的教材、教具于整套应用技术、经费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并在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艺等方面进行训练。

实施卫生教育的目标是在农村创建医疗卫生制度，以改进医药设备农村奇缺的状况，动员大城市中的医生到农村去，以造成公共卫生的环境，从而使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条件下有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此外，还要对农民实施公共卫生教育，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从而成为健康的国民。

实施公民教育，是要在一国社会的基础上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公共心和合作精神，而且要在人类普遍共有的良心上，发达他们的判断力、正义心，使他们皆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同时通过良好的公民训练，使他们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和政治道德，以立地方自治的基础<sup>39</sup>。

为进行四大教育，青年会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教育三种方式。学校式：就是采用平民学校的形式。具体办有“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和“平民大学”。初级平民学校主要针对十二岁以上已超过入学年龄的文盲，进行扫盲工作。社会式：它是以高级平民学校或平民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各种活动为中心，使毕业生按照四个方面继续受教育。这主要针对成年人和妇女。家庭式：家庭式教育是中国的特殊教育方式，它主要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使在家庭中的老少男女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分别有户主、主妇、少年、闺女、幼童五种组合<sup>40</sup>。这种方式常与学校式、社会式结合进行，目的是帮助改良家庭的日常生活，帮助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扩大家庭的责任感，减少对上学青年、儿童的反对和阻力，使家庭社会化、增进家庭的社会责任。晏阳初指出，以上三种方式因时因地分工合作，连锁进行，目的是

<sup>39</sup> 傅若愚：《青年会对于平民教育之贡献》，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50页

<sup>40</sup> 《基督教青年会与平民教育运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行，1930年，第25页

使整个社会都造成一种教育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

青年会与平教社所进行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率先将平民教育运动从城市推向农村，由基本上以识字教育为主而扩大为一种乡村改造运动，这种教育改革重心的转移，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19世纪60年代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新教育产生以来，而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几次重大发展，新式教育在大、中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取得对封建传统教育的重大胜利。但是，相对来讲，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教育，却始终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较大的改造。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占极大比例、农业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度来讲，农村教育的改造无疑具有极大意义。晏阳初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体会到教育应以提高占全国总人口85%以上的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又认识到农村教育的改造不能脱离农村现实的经济状况，直接将教育的改造与农村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同步进行。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对平民教育运动实践和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可以说导致了现代以来教育改革重心的大转移。毫无疑问，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从事这方面探索的远不止是青年会和平教社；但是，也应该承认，无论就其规模之宏大、组织之严密、计划之周详、历史之长久，以及实际影响而言，其它各个流派是难以与之相比的。

晏阳初提出的“四大教育”及“三大方式”，实现了平民教育的立体化和网络化。它不仅使平民教育内容与农民生活需要融为一体，而且突破了学校的观念，将平民教育的课堂延伸到整个社会，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科学知识开始走进农村千家万户，逐渐为农民掌握，成为他们生产的有力工具。

青年会开展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改造，关注的重点又是被遗忘、被忽视的平民和农民，它既不仿欧，也不仿古，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与众不同的改革思路无疑是对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空疏泛用的封建旧教育的有力冲击，也是对重城市轻乡村、重学校轻社会的所谓“新教育”的纠正和补充。它使教育界能够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去观察、思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近代化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平民教育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积极地配合了民国以来对清末教育的改革，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青年会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方法论虽然有许多历史进步意义，但也不可避免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比如晏阳初虽然认识到了中国农村社会存在愚、穷、弱、私四大实际问题，但是对造成这四大问题的根本原因却缺乏更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所以，他开出的药方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社会的问题，而只能局限在教育领域作一些技术层面上的改进。

### 第三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公民教育

一般地说，公民教育是随着西方近现代国家政治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是近代西方教育发展的产物。

在中国，公民教育是民国成立后才开始出现的。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对西方教育的一种引进。最初，尚无明确的公民教育课程，而且也只有少数学校在修身课内讲授一些公民学。到1922年第七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开会时，才决议在新学制内将修身科改为公民科。这是我国首次明确设置公民课程。这对改革我国的旧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明确设置公民课程的前后，“积极推展公民教育，并使之成为一全国运动者，实发端于青年会”<sup>41</sup>。而这又来自于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的提议和推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青年会是我国早期公民教育的积极倡导者。

#### 第一节 公民教育运动的推展

首先是在余日章的倡议和推动下，将推广公民教育作为青年会在20年代的一项主要工作计划。余日章当时在提出人格救国与平民教育两种观念后，不久又感到有必要在国内提倡公民教育。他在1921年受全国商教联合会等团体所托，与蒋梦麟两人以“国民代表”之身份，前往美国华府，监督北京政府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之谈判。余氏在会议时期不负国人所托，不但将会议报回国内，并将国内的支持转予政府代表，其间还协调留美学生的意见，并访问美国政界人士，争取支持。余氏认为此次华盛顿会议“未尽理想，固由于代表团未能尽责，然国内政治不修，民权民治民格未能做到，亦为失败之因”<sup>42</sup>。于是他开始谋求改进之道，并思考青年会对此的责任与贡献。在他回国后发表致各界人士的公开函中，他大声疾呼：“审大势之所趋，惕宗邦之多难，弥感完全人格之陶冶，实为救国唯一根本之途。吾青年同志，值此潮流，责任重大，尚望彼此作精神上实力上之勉励与鼓助，同心协力，勇往直前，庶上帝所企望于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应尽之使命，可以完成，幸何如之。”<sup>43</sup>

根据余日章的看法，当时我国外交的失败在于国内政治的失败，而国内政治要谋好，

<sup>41</sup> 董修甲：《青年会对于公民教育之贡献》，选自《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41页

<sup>42</sup> 转引自王成勉著：《余日章与青年会——一位基督教领袖的爱国之道》，载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709页

<sup>43</sup> 转引自查时杰：《余日章》，载于《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59页

则必要国民之觉醒。故他在青年会的提议中，以人格救国作为精神目标，而以公民教育作为落实的行动。1923年春天在南京开的全国干事会议上，余日章正式提出以公民教育为青年会的重大事工，并得到大会的赞同。到1923年10月于广州举行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时，遂正式议决青年会在其教育事业中，应提倡公民教育运动，以求迎合社会之所需，并推请余日章及刘湛恩两人共同负责规划事宜。

公民教育运动于1924年展开。在当时所发表的宣言中，首先指出中国处于危急的情势之中：“试看我国战云密布，匪盗如毛，学校十天有九天关门，财政像一盘散沙，一方面蚕食鲸吞的列强各国，处心积虑，共管呀，护路呀，闹个不休，内乱已尽够鱼烂而亡，外患更足以致我死命，五千年光荣历史和四万里锦绣河山，怕不一齐惨遭陆沉之浩劫！”<sup>44</sup>接着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今中外的道理都证明一国政治之好坏，全视各个公民之尽责与否。宣言最后表示，对于中国的问题，该宣言表示：

“我国人民，从前相习于专制政治日久，对于政治的意识及判断，向少运用，以致由麻痹而锈坏。我们往往看制定宪法，发布管制，今日放一巡阅使在某处，明日赔一注巨款给某国等等，好像事不关己，从来不去理会，至多亦采壁上观的态度，这就是中国今日争竞分裂的大病根！‘民’和‘国’不发生密切的关系，如何能成民国呢？……若一员公民放弃了他的责任，就立时一发牵动全身，影响全局。今日国运之崩溃时局之危局，不能不归属于各个公民之未曾尽他的责任<sup>45</sup>”。

因此，青年会决定计划发起公民教育运动，积极与建设性地诱导同胞，使国人觉悟自己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进而承担公民的责任，以促进国家的康宁，得屹立于二十世纪的国际社会。此运动之宗旨定为：“依照青年会本旨，运用社会教育方法，以培养中国和世界的良好公民，并促进社会上的民主风气”。目的是“一、提倡公民对社区，国家及世界应有的认识；二、促进民主生活；三、结合青年会友推广公民教育”。

其内容可以分为五项：（1）提倡广义与建设的爱国心。（2）促醒公民的责任与养成公民的人格。（3）研究中华民国的组织及法律大意。（4）讨论当今国中重要问题，如裁兵，剿匪，理财，兴教等。（5）演讲国际关系的要领及世界大势<sup>46</sup>。至于实行的计划，则是利用五四运动和五九国耻纪念的两个节目，在5月4日到5月10日之间举行为期一周的活动。活动形式主要是演讲，每天的题目分别为：“何为基督化公民？”，“公民与市政”，“公民与立法”，“公民与财政问题”，“公民与国内和平”，“公民与国耻”，“公民的责任”。另外，还配合进行有关新剧的表演和分发有关印刷品。举行会议时，要求在会场挂满国旗及各种公民教育图表，全体唱国歌。经过一周的活动后，青年会将与当地教育团体和热心人士组成“公民教育研究社”，透过开会研讨、游行、演讲、表演与

<sup>44</sup> 全国协会智育部：《公民教育运动的宣言及计划》，载于《青年进步》，1924年3月，第55页

<sup>45</sup> 刘湛恩：《五年来之公民教育运动》，载于《青年进步》1927年2月，第246页

<sup>46</sup> 余日章：《青年会倡办公民教育运动之缘起及其进行》，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7年，第136页

出版等方式继续推行这一运动。

在这一计划提出之前，即有广州、北京两地青年会先试办公民教育，组织公民教育研究社，加入者颇为踊跃。当年5月，有23个城市进行第一届公民教育周的运动。各地活动略有不同的特色，如宁波的市会（即城市青年会）试行公民选举，测验民意之所在；太原之市会与各学校联合办游行讲演；福州校会（即学校青年会）联合会合办讲演；苏州校会组织公民教育研究团；杭州校会举行中学以上学校的公民教育演说，还有地方举行公民国货展览会。<sup>47</sup>在第一年的开展中，各地的反应不错，都获得相当的成绩。到第二年继续推进时，举行活动的城市已多达23个。在整个活动中，共举行241次讲演，吸引了72424人，有2791人参加97处的公民研究社（团），另有295人组成64队公民宣讲队，有3660人参加以“怎样做一个中华民国的良好公民”为题的征文比赛，有46800人参观了有关的图表展，并有1352人参加公民选举测验<sup>48</sup>。另外，在第二年举办时，青年会还设制了十二种公民教育图片及一种公民测验表。

由于这两次举办公民教育运动的成功和反应良好，青年会遂决定将这一运动列为其重点工作。在1925年7月27日至8月9日召开的全国总干事会议时，通过青年会工作程序之四条具体办法，其中多与公民教育运动相关。其第一条即为：“青年会的程序，应特别注重公民教育，其目的在唤醒人民道德的觉悟，彻底的思想，与团体合作的精神。故于此数年间，宜提倡长时期的良好公民训练，并研究对内对外的时局问题而谋应付。”<sup>49</sup>在第二条则列出培养公民之三项办法，包括（1）竭力与其他机关合作提倡拒毒。（2）继续提倡平民教育及其进行事业。（3）试行家庭改进运动。第四条要求设一名专职干事来协同各市会办理公民教育。

在此次总干事会议上，还进一步确定了公民教育之宗旨、方针与程序。新定出的宗旨为：“提倡积极的建设的纯正的爱国心，促进社会公共之福利，讨论今日中国对内对外重要问题，以谋正当之解决，并培养国际同情与国际友谊，使之日益进步。”并具体提出了一项将这一运动由地方发展到全国的三年计划，即第一年提倡组织研究社，讨论团，宣讲队等。第二年提倡全城的公民教育研究会。第三年提倡全国的公民教育研究会。还建议采用巡回演讲，组织领袖研究团，讨论会等方式。当时还订出了具体全年计划，如每年十月十日为“国庆节公民教育运动周”，十月至五月进行“公民演讲”，“公民研究团”，“公民宣讲队”的活动。五月三日至九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在此周之后结束年度事业，并筹备暑期公教事业等<sup>50</sup>。

从上述总干事会议的有关决定，可以看出当时几项新的发展：第一，将公民教育列

<sup>47</sup> 刘湛恩：《五年来之公民教育运动》，第247页

<sup>48</sup> 陈立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最近之状况及其改进》，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25年，第102

<sup>49</sup> 顾子仁：《十年来吾国青年会之重大变化》，载于《青年进步》，1927年2月，第88页

<sup>50</sup>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45页，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编号U120-0-1

为青年会之特别注重之工作。第二，将过去公民教育运动从五月份一周的活动正式扩大成年度的活动。第三，加强推动公民教育的人员编制，并组织特别干事委员会，除原有的余、刘两人外，还加入顾子仁、陈立廷、胡貽毅、陈宗育等人。第四，把公民教育之培养的观念扩大。根据前列第二条之第二项办法，把平民教育也列入公民教育之中。这样，公民教育运动便分为两部份，前者为“对于不识字的奋斗”，后者为“好公民运动”<sup>51</sup>。

第三届公民教育运动周在 1926 年展开前，正值军阀乱政的高潮。青年会的同仁见国事纷扰，兵祸连结，遂在此次公民教育运动周中加入“和平运动”的主题，以注重和平问题之研究与提倡。另一在此届活动中之特色，是在活动内容上设计的更为细腻。例如在设计五月公民教育运动周的“和平运动讨论大纲”中，就为市民、学生、职工、少年及童子等不同的对象制作了四份。为在第三个年度更好地推进运动的发展，青年会还出版了相当多供使用的教材，计有“公民教育丛刊”十六种，“公民教育小丛刊”中文五种，英文四种，“公民教育唱本”三种，“公民教育图画”及公民教育幻灯片各一套，均得到社会人士之欢迎和好评<sup>52</sup>。

从青年会的公民教育运动的发展来看，这时当是一个高潮，各地均相当活跃地对公民教育予以尝试和提倡。游行、演讲、研究、讨论的活动很多，而感兴趣加入活动的民众也非常多。著名人士如马寅初、胡适之等也曾应邀作公民演讲。根据 1926 年 8 月青年会全国大会的报告书，政学界与教会界对公民教育运动的反应都非常良好，有如下的叙述：

自青年会发起公民教育以来，政学各界非常赞许；中华教育改进社还特函请青年会预备公民教育材料，送往美国费城展览，而中央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教育会等，亦均来函褒奖，并一致积极提倡。今者江苏省教育会已发起全省公民教育运动；各地各学校及教会，亦渐注意公民教育事业，并极愿与协会合作，一致进行。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更刊印公民教育特刊；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则组织公民教育委员会。此外，北京青年会公民教育委员会余仕廉君，亦发起中华公民教育促进社。各书坊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均刊印公民教育特刊，或刊登公民教育广告。其他教育家及中外名流对于本项事业之褒奖赞许，更是数不胜数。此举之为全国人士所欢迎，于此可见一斑矣。<sup>53</sup>

到 1927 年青年会推行第四年的公民教育运动时，正值 20 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最高峰时期。青年会的各项事情都因时局的关系，均不易推行，而积极推动之公民教育运动也受到影响。在 1927 年初，青年本计划将公民教育运动进一步扩大。当时拟议的活动有：（一）公民教育运动旬。即利用每年 5 月 1 日至 10 日的一连串节目来举行。当时五

<sup>51</sup>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 47 页

<sup>52</sup> 《第三届公民教育运动周计划》，载于《青年进步》，1926 年 10 月，第 113 页

<sup>53</sup> 刘湛恩：《全国青年会公民教育运动报告》，载于《青年进步》，1926 年 10 月，第 97 页

一为劳工运动纪念日，五四为学生运动纪念日，五七，五九为国耻纪念日，五十则用为国际亲善日。（二）为在各地举行每星期一次或每月数次之公民演讲，邀请名人或专家对内政或外交问题作有系统之讲演。（三）公民研究团。这是专为受过教育者互相讨论以求集思广益之用。（四）公民宣传团。是让青年学子到内地乡僻之处向未受教育者宣传公民常识。（五）公民养成团。是集合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仿童子军的组织，予以公民之训练。（六）公民训练会。是训练公民领袖之短期训练，使受训者自身可为完善之公民，又可引导他人做好公民。（七）公民班。乃是对一般大众授以公民当知之知识。（八）公民教育印刷物之出版。至于在全年公民教育的特殊设计，则有10月10日的“国庆节公民教育运动”日，开展公民教育；5月1日至10日，为公民教育运动纪念日；以及六七月的暑期公民教育运动及研究会<sup>54</sup>。

但是，这些所拟议的各个层面的活动，却在强大的反教活动下受到了许多局限。因为各地反教的情况不一，故各地进行的方式也不一，还有地方根本无法进行。如武汉当局为共产党把持，认为公民教育为国家主义的变相活动，而东三省方面又以为公民教育与国民党有关，均不克依原计划进行。而反教最强烈的长沙、南昌、杭州等地，更谈不上公民教育之实施。当时能够比较无碍地进行这一活动的，还是在出版公民教育材料方面。到1927年6月为止，几年来共出版公民演讲二十种，公民测验一种，公民教育丛刊二十种，公民教育唱本十六种，公民教育图书十五种，公民教育小丛书二十种，公民教育运动宣传品五种，而且销路在不断的增加。据协会书局的报告，1925年共卖出9288本，1926年则为32724本，到1927年的上半年，即已卖出129476本。<sup>55</sup>可见青年会出版读物之受欢迎，也可看出各界民众受惠之多。

自国民党在1927年4月实施清党后，反教的非基运动迅速消退，到1928年底北伐告一段落后，可以说没有再发生过攻击教会的事件。在这种形势下，青年会也就在经过整顿之后，再次推展公民教育运动。这可以从1929年10月中旬召开的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中看出。这次大会的宣言再次肯定了青年会近年所努力之方向，即人格修养，民生改进，公民训练，国际联谊四者<sup>56</sup>。大会所通过的多项决议案几乎多多少少都涉及青年会。由于此次会议是在经过非基运动之高潮与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召开的，感到国民在思想、生活与政治、经济上均有所改变，因此在会议上也对公民教育上作了一些调整。因为当时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定都南京后，认为市政建议为各种建设之首，故首先提倡都市建设。而青年会认为公民教育事业与市政关系密切，可协助市民了解市政，行使民权，故特制定各种市政知识之图表、书籍，举办市政训练旬，组织市政训练班，并展开议员选举之试验。这成为当时青年会公民教育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另外，对于全年公

<sup>54</sup> 刘湛恩：《五年来之公民教育运动》，载于《青年进步》1927年2月，第246页

<sup>55</sup> 董修甲《青年会对于公民教育之贡献》，选自《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2页

<sup>56</sup> 《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宣言》，附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报告》，杭州，1929年



民教育之分月实施，也有了新的安排。分别为：二月廉俭运动，三月户外生活，四月职业指导，五月公民训练旬，六月卫生运动，七月八月“到民间去”，九月识字运动，十月国庆节，十一月齐家运动。而对象也更细分成农民，已识字之少年，不识字之少年，学生，工厂职工，商店职工等六类<sup>57</sup>，以便依各类对象的区别而进行不同之公民教育。

然而就在国事较为稳定，青年会准备重新进行各种工作之时，余日章却因过度劳累而心脏病复发，在1930年5月入院诊治。令人奇怪的是，青年会自他患病休假以后，在工作方向上也做了调整。原本是以公民教育为重点的工作，居然不再为青年会所强调。最明显的地方，即是在1934年1月下旬于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大会上，用“合作建国”为总题，大会举行了六项重点演讲，并提出了五类决议案（宪章修正，学生事业，社会改造，青年与宗教，其它），但其中均不见任何公民教育之字眼或实施方法。在1935年青年会出版的五十周年纪念册中，新任的总干事梁小初在“本协会今后十年事工计划”的文章中，也没有再提到公民教育。故自此以后，虽还有若干青年会地方单位在进行公民教育，在协会的青年书局中继续销售有关书籍外，公民教育运动可以说是随着余日章的离去而告终了。

## 第二节 公民教育运动的特色

公民教育运动虽然推行的时间并非很长，对国家、社会所产生的效果也很难评估，但是从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两点是值得特别加以注意和讨论的。第一是在民族主义和反教的前提下，公民教育运动对于国家与国际的关系。第二是公民教育运动与青年会本色化的发展关系。在具体讨论这两点之前，我们可先概述一下青年会与当时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五四以来，民族主义的浪潮冲击着社会上各个团体，即使教会也不能例外，而后在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更逼使基督教会国事的立场上摊牌。而许多教会团体也一反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或多或少的对国事发表声明，或探讨教会对国家应有的态度。青年会是在反教运动中最早受到批评的教会团体之一，同时也是在整个20年代中受害最烈的团体之一。故青年会的反应以及公民教育运动与时代的相关性就特别值得重视。从时间发展上来看，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开始时，上海非基学生同盟的宣言中即有“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是要养成资本家底良善走狗。”<sup>58</sup>1923年，青年会召开第九次全国大会，会上一反过去不提时政的立场。在大会报告书中，一开始即谓“试问世界大势之变动如何。国中时局之推移如何。吾青年会事业之进退利钝更如何。此当为吾人所其

<sup>57</sup> 余日章：《两年来之基督教青年会事业》，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31年，第48页

<sup>58</sup> 《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宣言及通电》，载于张钦士编《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1927年，第58页

欲考核而念知者也。……兴全国人士鼓棹于洪涛万丈之狂海。以救危局而远前津。则吾青年会所以自尽报国之天职也已。”<sup>59</sup>显然，这意味着青年会受到时代冲击，不但对国事感到担心，且思有所贡献。

1925年，因“五卅惨案”的爆发，再一次掀起反教行动。当时民情激情，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和行动普遍高涨。由于基督教一向被认为与帝国主义有关，故非基督教运动也借机而起。青年会的全国协会就在上海，自然也深感外在的压力。全国协会当时的看法是，“当时全国人心激昂，热血沸腾，集注于该案之交涉，一致主张打倒强权，伸张公道。协会观察大势，深觉当其前者即系本会服务社会之绝大机会，不可不奋赴之；于是乃排万难而进有所图。”<sup>60</sup>故青年会积极介入“五卅惨案”之调解。也正由于青年会介入调解，使其感触良深，因而再一次强化他们对于公民教育的看法。在五卅惨案后，全国协会表示：

欲求根本解决之道，非将列强加于吾之一切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完全解除，实行关税自主，撤废领事裁判权不可。同时国内政治腐败，军人专横，非将其彻底澄清，亦无以善其后。欲达此二目的，非使人民一致兴起，合力对付不为功。欲使人民一致兴起合力对付，尤当使人民对于各问题有明了之知识，相与警惕于其切肤之利害关系，庶乎其可。<sup>61</sup>

从以上的引文和事例中可以看出，公民教育是青年会与时代互动的结果，既含有去除不平等之束缚的对外要求，也含有澄清国内政治的对内要求。这两者均是公民教育的重点。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基督教是一追求和平的宗教，也是超越国界的宗教，而且青年会是一国际性的运动，那么青年会或是余日章在提倡公民教育运动时，是如何解释这国际现象，如何看待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应该如何，这些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

青年会在此时期发表了不少对帝国主义、国家主义与国际关系的文章。余日章在方面的著述很多，而且也提供了一套解释的理念。他在“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一文中，对此讨论的最多。他首先讨论国家主义的观念。他表示国家主义一般说来是为国家的利益、主权和独立而尽忠。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是可能有冲突的。因此国家主义在民族间会互被视为帝国主义或过激主义。而今日世界之不安即是这种只顾及本国的国家主义之错误观念所造成。余氏认为这种仗恃较优的智慧、本领和较高的地位、武力来欺凌他国的方式，并非爱国，而是在造成报复相寻的祸国。他认为国家主义有消极与积极两方面的意义<sup>62</sup>，就消极方面来说：国家主义不应当是牺牲别国的偏爱本国；不应当不顾是非惟知拥护本国的名誉和利益；不是不顾其它民族的利益和权利的愚忠和盲爱；

<sup>59</sup> 《第九次全国大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82页

<sup>60</sup> 《第十次全国大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书》

<sup>61</sup> 《第十次全国大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书》

<sup>62</sup> 余日章：《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载于《青年进步》，1927年1月，第44页

不是倚仗较高的知识和武力，扩展本国的利益；不应当乘其它民族处境困难或势力弱小而攫取不该得的利益；不应当轻忽本国对于世界公共利益所负的责任。

就积极方面说来，（一）国家主义应当清清楚楚的向一国的人民指明他们对于国家应负的责任，如协助本国国民性的充分发展，和本国天然资源的充分开发。这也不光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享用，也是要使他们本国对于世界文化的总和能有所贡献。（二）国家主义应能感动并指导各民族循着正义公道和真理的路径而进行，同时更当激励并强制他们扶助较弱的民族，为困苦无告的国家请命，虽于自己将有重大的牺牲也所不惜。（三）国家主义应深切的觉悟，一个民族所得的较大的知识经验才干力量，那不是可以用来自便己私，或欺侮较弱的民族的，应当用来为他人作更大的服务。

在国际主义方面，余日章认为因为科学的进步，缩小了各国间的距离，使彼此在物资、精神、知识上更需互相依赖。他以家庭中的兄弟来做比喻，在世界家庭中的各国，容或在能力、遗传、才能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并不因此丧失他们作为家庭一份子的资格，反而因为不同，彼此可以把他们所有最优美的特点贡献给全家庭，尽力来辅助家庭中的其它份子。因此他认为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结合的。他表示“国家主义是国际主义必经的阶段，而国际主义不外是国家主义的完成”；“唯真正的国家主义者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反之，惟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国家主义者。”<sup>63</sup>余日章还在其文章的结尾表示，这种同胞物与的世界大同，是应以“上帝为父”的这个理想为基础。

余日章正是在这种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他的公民教育运动的政治主张。他在为文介绍公民教育运动时曾提到国人所应该从事的行动是：“（甲）对内：吾人应提倡广义的，建设的，纯正的爱国心讨论立国大道，诠释共和真谛，研究各重大问题，若裁兵，和平，国民会议，禁烟，财政，教育等激发民治的精神，促起团体互助的觉悟，养成高尚的人格。（乙）对外：研究各不平等条约之要点，以及缔结平等的互惠的新条约之准备，宣传泰西文化之优点，以备吾国改造之采择，发扬吾国文化之优点，以供泰西之研究，讨论国际间的关系，以谋世界友谊之进步。”<sup>64</sup>上述这“广义的，建设的，纯正的爱国心”，也就是余氏的国家主义，而“宣传泰西文化之优点，以备吾国改造之采择，发扬吾国文化之优点，以供泰西之研究”的说法，也即余氏所谓的国际主义。

青年会并没有赞同帝国主义行为，也没有避谈西方国家曾借教案侵略中国的事实。余日章与其同仁的做法是划分教会与西方国家之关系，并谋西方国家人民之友谊，以求收回国权，得到国际平等的待遇。例如陈立廷在“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一文中即直谓帝国主义违反耶稣的教训，故基督教决非帝国主义的走狗。其实帝国主义早有谋夺中国权益之野心，不过是以教案为借口。至于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的努力，青年会 1925 年在

<sup>63</sup> 余日章：《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载于《青年进步》，1927年1月，第48页

<sup>64</sup> 余日章：《青年会倡办公民教育运动之缘起及其进行》，第138页

淡江大学召开的全国总干事会议中曾决定要充实国民知识,采国民外交的方式来促使外国改变。该次大会的宣言中写道:

青年会素抱基督博爱正义人道之精神,对于国际种族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政策,认为与基督精神相违反,足为世界友爱前途之大障碍;尤以百余年来中外所缔结之不平等条约为酿成东西人士恶感之一大祸根。吾人允宜先加切实之研究,彻底之了解,造成正当舆论,鼓起世界同情,以消弥未来战祸于无形;同时竭力提倡建设的工作,以造成国际友善,种族平等,而普世界于大同。

在这种国际亲善目标下,青年会做了不少的国民外交,如派代表出席1926年8月芬兰赫尔新基召开的世界青年会大会,派副总干事顾子仁乘其到日内瓦出席万国禁烟大会之便,在1927年上半年访问美国各地。但最著名的活动,也是代表余日章的国民外交观念的,即是他参与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此会由北美、檀香山与中国的青年会联合发起,由太平洋之国家的国民出席,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并以国民的立场,发扬舆论,督促政府,改善国际关系。余氏自与美国方面联合发起后,即积极在国内筹备。中国代表团在每次出席时均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氏每次出席会议,亦均在会中恳切陈言中国需要得到受尊重的主权,盼望各国代表共同寻求光明和真理,主持正义和公义,而共谋促进世界的友谊。

虽然余日章与青年会对于国际关系提出了一套理论,其中也包含了中国“世界大同”的观念,甚至还有提升民智,发挥国民外交的做法,但是对于20年代在高昂民族主义下的中国人,所要的是想急切的“打倒帝国主义”,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没有办法耐心或冷静的接受这种渐进式的救国方式,而且这样子的国际主义,似乎是太遥远的理想。因此,甚至有许多青年会的干事也离职去政府工作,或是寻求其它促进其改变的政治方法来帮助中国。

公民教育运动就是20年代青年会本色化的重要表现。当时青年会本色化有两方面,一是完全由中国人负责和主政,另一是参酌中国的情况而推动各种运动<sup>65</sup>。但是白人格救国到公民教育运动,可以看出越来越走向政治化。在当时的青年会全国大会宣言中,也不时直斥帝国主义与时政弊端。这与青年会的原始不涉入政治的原则越来越远。到了1925年夏,全国协会委员会及全国总干事会议时,认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应继续为一中国化的、二基督化的、三少年化的、四义务员的运动而努力。虽然全国协会报告书中表示,此为中国青年会因时制宜随机应变的需要,亦是中国青年会特树一帜的地方,但是随着政治意味的加强和把中国化置于基督化之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少不同的和反对的意见。

<sup>65</sup> 根据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的报告书,其中有“北美青年会固子初即认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应完全由中国人负责与主政唯一不可动摇之原理,而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亦处处以此自责,不敢放弃。”

如前所述，公民教育是青年会在中国本色化的发展。但是这种本色化的发展是否为青年会的西籍干事所认同，是否中西干事在此时期均和谐相处，他们对余日章的领导是否完全接受，这应该进一步的探讨。虽然余氏曾经说过：“西籍干事并不会因公民教育不在西方基督教青年会的项目中而加以反对，反因此二计划之适时性而热心的加以支持和促成发展。”但是公民教育运动不见于西籍干事给北美总部的行政报告或工作报告中，而且中西干事在 20 年代尚发生过几次重大歧视之争。首先是教产与教权的问题。原本西籍干事是归于北美协会派来中国之领袖干事指派工作和管理，而北美协会捐钱建筑之不动产（即许多的青年会所）也归在外人财产之下。余日章上台之后实行完全由中国人负责和立政之计划，很快的就与当时驻华领袖干事贺嘉立（Charles W. Harvery）发生冲突。余氏为此事在 1924 年赴北美协会磋商，取得将不动产移交青年会保管与取消领袖干事，由全国协会来节制西籍干事之决定。但在 1925 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总干事会议中仍为西籍干事之指派和管理派发生激辩，余氏虽强调“合作而非控制”的原则，但坚持一切由全国协会来控制。因此造成贺嘉立在会后立即辞职。而全国协会也于 1926 年 2 月 1 日另设礼才部来处理西籍干事之事。如有一篇研究当时青年会的论文曾提到，早在 1923 年就有美籍的资深干事批判全国协会是一官僚机构而非一教会运动之地，而大多数的美籍干事亦普遍的对全国协会有抗拒的情况。到 1930 年，青年会的陈立廷写信给回美休假的副总干事鲍乃德（Eugene E. Barnett），提到余日章“被指控其控制全国协会，到每一个人不敢表示不同意见的地步……这些不友善的控诉深深伤害到大卫（余氏英文名），而他正深思退出全国协会之事。”在这种情况下，西籍干事对余氏或全国协会所进行本色化的公民教育运动采取冷漠或抗拒则是很自然的事。而这也可能部份地解释为何余氏在患病无法再行干事之职后，青年会突然改变事工的方向的原因<sup>96</sup>。

### 第三节 公民教育运动的历史意义

公民教育运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来自五四前后民众对国事的关心，国权的争取，以及民初军阀乱政的背景。当初余日章担任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之职务，认为国事不振系因民智未开，而民智之陶冶必须要有人格之训练与智识之教育。而智识方面尤以养成良好与健全之公民为要。所以他以青年会来推行公民教育运动。对于教会而言，此为一项走出教会面对社会的运动。对于国家而言，则是教会关切国事，提出救国、建国理想与方案的行动。

公民教育运动之所以受到当时学界与政界的欢迎和赞许，是因为其不仅显示基督教爱国，认同国家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提出建立现代国家，是切合时代急需的运动。过

<sup>96</sup> 转引自王成勉著：《余日章与公民教育运动》，载于《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4 年，第 533 页

去基督教会的社会功能，往往只被认为是慈善机构或是社会福利单位。一般教会所常从事的是医院、学校事业，或是赈灾、救济、戒毒等活动，并往往局限于地方和部份人士。鲜有着眼于国家，提出关系到促进良好政治的方案。不但教外人士以此来看，就是教会人士也都强调政教分离的说法，有意避开任何与时政有关的活动。这在民国时期是教会思想的主流。

从这个角度来看，余日章与其推行的公民教育运动就极具意义。中国民众的贫、病、文盲、无知与漠视民权，实为清末民初政治腐败与国家落后的原因。要使国家走向现代化，则必须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余氏以其个人强烈的国民精神与提升政权之事业心，成了构想公民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

一般认为，基督教会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上在医疗、科学、教育、农业等方面的成就较为明显。其实，它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迪和民权发展亦有重大的贡献。而且在这方面的贡献，其价值与重要性绝不亚于前一方面。余日章所提倡的公民教育运动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余氏在世的时间不长，而且公民教育运动在日后也未再继续成为青年会的重点，但是余氏当时的眼光和思想，对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的苦心探索，以及在20年代大力倡导和推动这样一场基督教徒的有益于救国、建国的运动，不但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为他自己，为青年会，也为当时的基督教会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 第四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现代体育

近代中国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基督教青年会密不可分的。诚然，在青年会之前，教会学校也有体育比赛或体育运动队等，如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 1890 年就举行过田径运动会，但当时的运动项目比较简单，也还没有训练有素的专业化体育人员。鉴于体育有助于提高青年的身体素质，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培养其乐观向上的性格，而且通过体育活动还能吸引许多青年参加青年会，故青年会一直很重视体育。青年会设立体育部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并提出：“提倡国人注重体育训练，体育专门人才研究，体育比赛集会，借以辅助各地方青年会体育之进行，造成国民健全之身躯，强盛之精神，皆该部之职务也”<sup>67</sup>。各级青年会都把开展体育视为其重要的活动内容之一，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是青年会推进了中国体育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社会化，使它向近代体育的方向发展。“青年会是中国新体育的向导，这也是人尽皆知的。最初是各学校的体育班，后来是校际的比赛会，接下来是各省和全国的运动会，最后是国际的运动会，都由青年会首先倡导。”<sup>68</sup>

### 第一节 基督教青年会对近代中国体育的主要贡献

#### 一、青年会的体育指导思想

青年会体育的指导思想随着时代之不同，社会发展变化之需要而有所不同。1931 年以前，主要宣传体育是“正当娱乐”，是“强种强国”的基础。强调各青年会设置各种健身设施，“……正是要使入会的青少年得到一种有益身体的正当娱乐，锻炼成健全的体格，以辛勤苦干之预备”，“我国百年以来，人种日形积弱，故列强以远东病夫相讥，……极宜提高尚武精神、强种强国……”。<sup>69</sup>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发起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在爱国教徒的支持下，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在青年会的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抗日的文章，强调“体育救国”

<sup>67</sup> 余日章：《说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任务》，载于《青年进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编，1917 年 4 月，第 19 页

<sup>68</sup> 鲍乃德：《中国青年会之史的演进》，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 年，第 78 页

<sup>69</sup> 苏克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5 页

<sup>70</sup>。很多文章指出：“国人救亡图存，团结御侮的工作实刻不容缓，必须号召民众从事运动，锻炼体魄，使每个国民都训练成钢筋铁骨之健儿，然后始能保卫祖国，驰骋疆场，担当救国的大任。”<sup>71</sup>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主办体育事工研究会，会上提出了体育教育的新概念，认为“合乎理想的体育教育，可以培养德、智、体、群四育并进的人格，使个人在社会中可以过一种更完备更有效的生活”；认为“如果体育的目的仅止于锻炼技能、发达肌肉、或以夺取锦标或以取乐自娱，那就不足以称为真正的体育教育”，“青年会的体育事业应成为培养整个人格的总目的下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目光应从记分牌上转移到参加活动的会员身上”<sup>72</sup>。总之，强调应重视体育对培养整个人格的重要意义。

## 二、强健之路——青年会对近代体育的历史贡献

### （一）传播近代西方体育思想

20世纪初，正当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迅速发展之际，许多西方著名青年会体育专家先后来华任职，大力宣传体育运动，为在中国广泛开展体育运动作了舆论准备。这些宣传活动首先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地铺开。1903年上海青年会举办的一次体育宣讲会，到会者达140人之多。会议主持人黄佐廷首先强调说明：“体操为中国青年最急之务，其利赖无穷，近之在一身，远之在子孙，推而广之即在全国”。接着，由华尔克以西语阐述体操的益处：一有益于有职业之人，二有益于各学堂之学生，三有益于毕业出堂之学生。

1904年至1908年，米华的天津青年会干事罗柏森（C. H. Robertson）在北京、天津等地多次举行宣讲会，并到各校演讲，宣传开展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介绍“西洋体育”活动的情况，号召青年学生开展西洋体育运动。上海青年会干事麦克乐（C. H. McCloy）也在上海、南京一带宣传体育运动。1916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体育科，麦克乐受聘到该校任科主任。1924年，麦克乐发表《体育与德谟克拉西》一文，对体育教育的重要性作理论上的阐述，认为体育教育能产生民主的思想。他写道：“体育教育能有增进中国德谟克拉西程度的可能，所以体育专家，应该知道这一种贡献在什么地方，就有积极建设的功用；而教育专家也应该要求体育专家从这一方面帮助教育的进步。……”麦克乐因此要求体育专家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方面训练他人，操练其肌肉；一方面能做中国德谟克拉西的文化中的先导之人<sup>73</sup>。他把西方国家所体现在现代体

<sup>70</sup> 王琦枚：《青年会的体育事业》载于《北平青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1937年7月，第20页

<sup>71</sup> 转引自高时良和陈名实编著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科学文化》的254页，香港人民出版社

<sup>72</sup> 王其慈、李宁：《中外体育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页

<sup>73</sup> 《体育与卫生》第3卷第1期，1914年3月，第33页



育中的民主精神介绍到中国来，从理论上证明了西方现代体育运动的先进性。还从体育教学的角度，论述贯彻民主精神的各种方法，试图从体育运动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推动当时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sup>74</sup>。麦克乐还编辑出版了多种体育教科书，对传播西方体育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其中《体操释名》是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本体育术语书，第一次基本规范了体育术语。天津、上海等地青年会还根据麦克乐等人的宣讲组织体育表演，展示近代体育训练方法及其成果，产生了较大影响。

### （二）引进和推动近代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展

西方体育运动项目在中国的开展，以体操为早，继之有田径、游泳等，足球等球类运动稍晚。篮球运动最早叫筐球，就是由青年会引进到中国的。189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北美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的体育教师奈史密斯发明了篮球，很快就被介绍到中国。1895年来会理牧师到天津时发现，当时人们称“筐球”的运动已经介绍给了天津青年会的成员，“会员对篮球亦极感兴趣，故一时有成为群众运动的气概。但是，这种运动只在会所草地围墙的背后举行，颇有狭隘不便之感。”<sup>75</sup>尽管活动范围有限，但毕竟开了先风。在美国创办的教会学校中，青年会都大力帮助推广篮球运动。如福州的英华学院大约在19世纪末即开展“打球（按指篮球）运动”，到20世纪初，这个“打球”即列为学校必修课，说明在这时期全国已较广泛开展篮球运动。

1912年奈史密斯的学生蔡乐尔（C. A. Siler）来华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他积极推广篮球运动，训练中国的篮球运动员，定期组织比赛，使我国篮球事业向专业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天津青年会建立了基本的体育教育原则，以指导当时的体育教育工作和竞赛活动。蔡乐尔不但在青年会里推行篮球，而且经常到天津其他学校任义务指导和裁判，1915年和1917年的第二届、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上任中国篮球队指导和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教练。1916年聘请毕业于通州协和书院的董守义到天津青年会任体育干事，积极推动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组建了天津青年会“竞进篮球队”，并在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战胜日本队。1927年董守义总结国内外篮球运动的进展情况，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撰写了我国第一本篮球专著《篮球术》，1928年修订更名为《篮球》。

排球运动在中国的开展约始于1905年，广州、香港的一些学校最早开展这项运动。1911年，加拿大人柯乐克尔（Crocker）被派到上海青年会工作，他在华东地区大力开展排球运动。1914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排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比奥运会承认排球运动要早得多。游泳运动开始于十九世纪末，最先在中国沿海城市开展。早期游泳池是外侨建造，中国人不得入内。1909年，上海青年会建造了中国自己的游泳池，并规定每年举行一次游泳比赛。在1913年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首次参加国际游

<sup>74</sup> 高时良 陈名实：《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科学文化》，香港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sup>75</sup> 苏竞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泳比赛。网球运动最先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传教士和商人中流行，1906年北京地区的教会学校首次举行校际网球比赛，后来青年会干事也建议把网球列入1910年全国运动会项目。

#### （三）举办专业运动会和组建体育机构

1910年，青年会以举行全国性运动会的时机已成熟，特派遣爱克斯纳到南京筹备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和运动会<sup>76</sup>。这次运动会于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在南京劝业场举行，项目设置有田径、足球、网球，篮球是表演项目。此次运动会具有近代大型运动会的雏形，全国各地出席的运动员有150人之多，均为男子项目，参观人数达万人以上，辛亥革命后被迫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与此同时，正式成立了以青年会干事为主的体育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个组织虽属临时性机构，“既无固定之会址，又无完整之系统”<sup>77</sup>，但毕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体育机构。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时，承认它是自己的前身。1913年“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共同成立了远东运动机构，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一界远东运动会，训练参赛选手及会务筹备均由各地的青年会主办。1921年体育界利用在上海参加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的机会，成立了“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筹备会”。1920年远东各国青年会控制的远东体育协会第一次同国际奥委会发生的联系，它标志着东亚体育开始与当时的国际接触和接轨<sup>78</sup>。同年，时任中国大学校长、曾任青年会第一任中国籍总干事的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民国初期，由于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取得成功，又受参加远东运动会的鼓舞，所以不仅教会学校，也同时带动了公立学校开展各种运动和竞赛，促进了省、市体育事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青年会又组织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负责人是“北京体育竞进会”名誉秘书、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侯格兰德（A. H. Hoagland）。这次运动会于1914年5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天坛运动场举行，只有96名运动员参加，时间也很短，仍然没有女子项目。

1924年5月22日至24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跑马场举行，由“全国业余运动联合会”和武昌青年会等人士负责筹办。这次运动会上“一切现代运动的比赛都有了”，田径赛、足球、网球、篮球、棒球、中国拳术等，并首次允许女运动员参加比赛。1930年，在杭州青年会的积极促动下，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由浙江省政府主办。1933年，

<sup>76</sup> 《最近三年内青年会成绩之报告》，上海档案馆 U120-0-1，第10页

<sup>77</sup> 转引自陈新生 李宁：《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近代体育的兴起》，载于《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10页

<sup>78</sup> 宋如海：《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61页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由国民政府主办。中国终于形成了具有近代体育意义的全国范围的运动会。

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于 1915 年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持下在上海举行。由于 1914 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涌现一批体育能手,使能组成强大队伍参赛,结果中国获得三个单项锦标和总锦标,这次胜利引起国人的极大振奋<sup>79</sup>。

#### (四) 培养体育专业人才

基督教青年会在提倡近代体育运动的同时,十分重视培养体育专业人员。北美青年会派艾思诺(Max J. Exner)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是近代中国体育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件,他正式开始了现代体育的训练与推动。1908年11月他来到上海,就招聘了20名青年举办“体育干事培训班”,进行近代体育训练。艾思诺还在上海青年会举行健身班、运动队、团体比赛、体格检查及沐浴的健身活动等,为各地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培养人才。先后开办过篮球、排球、足球、游泳、乒乓球、手球、羽毛球、体操、国术(即武术)、跳水、举重、拳击等体育项目的培训班,有些体育项目还分初级班和高级班。

1916年在培训班的基础上,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创办“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任本校教务诸君皆博学硕望,一时名流”<sup>80</sup>。由史温(A. H. Swan)任教务长,麦克乐、蔡尔尔等著名体育专家均应聘到校任教。该校学制四年,前两年为基础课。基本课程有《圣经》、青年会会史、生理学、解剖学、显微镜解剖学、生物化学、运动生理学、细菌学、体操教授法、运动教授法、个人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生殖学、急救伤科、体育史、体育部用品研究、演说术。学毕二年课程者,给予修业文凭,称为体育员;修完四年课程者,给予毕业文凭,称为体育师。学员来源于全国各地青年会和教会学校的体育教师,经培训后,又回到青年会和学校任职,推动了全国体育的初期发展。该校人才辈出,早期体育家吴蕴瑞、张信孚、马约翰、郝更生、董守义、宋如海、胡宝田、王毅成、张汇兰、许民辉等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为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协会还曾选送各市青年会的体育干事去美国留学进修。1923年派刚刚在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篮球比赛战胜日本的总教练、天津青年会体育部主任董守义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春田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向篮球创始人奈史密斯学习。春田学院是由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学校体育部于1887年发展起来的<sup>81</sup>。还有郝更生、马约翰、许民

<sup>79</sup> 张宏亮译:《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载于《近代中国体育思想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体育研究所,1994年,第109页

<sup>80</sup> 宋如海:《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62页

<sup>81</sup> 转引自赵晓阳:《美国春田学院与近代中国体育人物》,载于《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4年2月,

辉等也到春田学院学习过。

青年会还促使政府更加重视体育的培育和发展，如北美青年会的麦克乐（C. H. Meeloy）通过他任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体育组，提议和改进学校体育工作，1923年第二届年会上，通过了由吴蕴瑞、邵汝干提交的《各省增设留学体育学名额案》，敦促政府选派体育留学生，以培养高水平的体育教育人员。

### （五）开辟体育场地 推动社会体育活动

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在专业体育方面培养人才，参与组建体育机构，而且在推广社会体育方面也是先驱，努力使其朝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青年会往往在建造会所的同时，注意开辟体育场地和相应设施，籍以引导青年开展较有规模的体育活动。青年会的会所是那个时代各个城市里最为现代的建筑之一，它们不仅是青年会发展的标志，而且是青年会发展体育运动的条件和前提。

1897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建立会所时即开辟了运动场。1913年又在东马路的会所建室内运动场，开展室内体操和中华武术等运动。1900年上海青年会在老靶子路租空地作运动场，办体操班。1906年，上海青年会建立四川中路会所，并建造室内健身房和游泳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于1912年在东单建造的会所，内有健身房、体育馆、保龄球房、沐浴室等，体育馆配有单双杠、吊环、吊绳、跳马、哑铃以及各种垫上运动设备，楼上还有跑道。后开辟室外运动场，北部设篮球、排球、网球场，冬天改作滑冰场，南部设有儿童游戏场、滑梯、秋千等器械。这些体育设备项目齐全完善，更重要的是它不局限于基督徒或青年会会员活动，而是面向社会。除天津、上海、北京外，各城市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均有体育干事负责开辟运动场地、设置运动器械、开展体育活动，这对于推动我国运动场地的建造和运动设施的完善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sup>82</sup>。

### （六）促进体育研究及体育书刊的出版

基督教青年会还力图规范体育活动，提高运动水平，因此对体育活动的规则、裁判、理论研究、书刊出版等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它对中国体育运动的科学化及与世界性体育比赛接轨等方面作出很大贡献。1915年以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使体育运动规则能为广大群众所了解，在翻译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陆续出版了各种中译本，这些译本对规范近代体育运动有着重要作用。上海青年会书局出版的就有足球、篮球、网球、田径、排球、垒球、棒球、美式足球等规则，用以指导当时的各项体育比赛。

在体育理论研究、体育刊物出版方面，麦克乐的贡献最为突出。他擅长田径、体操，又是医学博士，在体育技术和理论上都颇有造诣。所讲体育理论多以心理学、生理学为

第33页

<sup>82</sup> 转引自周佳泉：《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近现代体育》，载于《20世纪的中国体育》1998年第1期，第28页

依据，并把体育运动同社会政治、学术思想结合起来。1922年春，麦克乐编辑出版的《体育季刊》，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体育刊物，对全国的体育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秋，中国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常会，在麦克乐提倡下，成立了“全国体育研究会”。他是该会的中心人物，凡属调查、研究、出版刊物等都由他先提出方案，然后付诸实施。

1927年以后，青年会的影响开始减弱，“今体育重心，半在学校，半在民众，青年会已无能为力”<sup>83</sup>。这与此时国民革命方兴未艾，大江南北收回包括体育在内的教育主权运动有关。外国体育专家相继退出中国舞台，回归本国，中国体育运动的领导结构，一时青黄不接。

## 第二节 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事业发展的原因

### 一、“尚武”救国

政治改革造就青年会体育事业传入的契机。“内忧外患”是清朝末年中国的真切写照，因此，有识之士在“救亡图存”的前提下展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改革运动。虽然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终因战败而烟消云散，然而却无心插柳的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贡献。

屡战屡败的中国，开始检讨其积弱不振的原因，严正地批评“静以养生”的传统观念，一时之间要使中国富强必“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的观念风起云涌，“尚武”观念成了救国药石。民风的转变，使得文弱的中国开始“动”了起来，体育在救国的前提下跃为主角，无疑的对于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事业的推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第二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应将体操科列为必修课程，它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正式颁行全国的重要法令，同时确定了体育在我国教育中的地位。

综合以上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发现，救亡图存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时代背景，造就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事业传入与发展之条件。基于政治上改革的需求，积极的向西方学习，青年会体育因洋而贵，造就了他发展的空间，而「开卷有益戏无功」以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在「救亡图存」的实际需求下渐为「尚武精神提倡」所撼动，教育法令上更明令条文，显示其对体操的重视。其次，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基督教更是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日益增多的传教士及教友为青年会的引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当时创造了各种有利环境。再加上近代体育项目本身具有的群集性、趣味性、活泼性等因素，青年会体育事业发展的内外条件都已具备，青年会体育

<sup>83</sup>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1933年）版，载于《社会体育事业发展史略》第109页

事业的引进，风行是势所必然的。

## 二、“同气相求，一心一德”

谢扶雅曾对青年会作如下阐述：“青年会之最著名者，为其团队精神，每一城市青年会的干事同工，多者四、五十人，最少者亦有八、九十人。他们都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恍如一条心的样子，兼且，不但一个会的同工如此，全国数十个会的干事数百人，亦恍如一个有机体然。为了彼此通讯密切及定期会刊之交换，兼以每年或每数年，必举行全国性的会议，因而“同气相求，一心一德”。由谢扶雅先生对青年会组织的描写可以看出青年会是一个和谐而互助的组织。

青年会是一个极重组织系统的团体。特别是体育一项，基督教青年会凭借其严密组织结构使其体育决策得以由上至下，由左至右，由点而面一体执行，这对其体育事业的推展，无疑是一项极有利的因素。

以基督教青年会协助筹办历届远东运动会为例，当青年会全国协会接下筹办任务后，即运用其组织展开一连串准备工作。首先由董事部责成体育部主任体育干事担任远运会总管理，负责处理业务，选拔中国代表队及拟定计划训练选手。全国协会体育部拟定计划后则由所属数十个市会体育部在各地积极展开准备工作，并由全国协会体育部协助督察之。例如广州青年会部便负责该省优秀运动员选拔工作，选出田径、排球、足球选手共 16 人，代表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全国协会的体育干事麦可乐并亲自到广东对各级学校发表演说，动员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训练，以提高成绩。并协助督导该省选拔工作（麦可乐，民 10）透过如此纵的联系，使运动会的筹备、选拔、训练工作得以同时在全国展开。其次，青年会也透过横的联系来协助整个政策的推展。例如书报部、演讲部大力的投入宣传工作。先后发表在青年会刊物上有关历届远东运动会的宣传或检讨文章，如「我对于这一次开远东运动会的期望」（麦可乐，民 10）；「第五次远东运动会的成绩」（麦可乐，民 10）；「远东运动会的准备」（麦可乐，民 11）；「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的教训」（麦可乐，民 12）；「失败的原因」（麦可乐，民 11）；「远东运动会及中国各地运动会改用米突制」（麦可乐，民 13）……等等，可谓琳琅满目。除此之外，干事养成部对于体育师资人才、运动赛会组织、举办人才、运动裁判人才……等之培养，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体育图书、运动规则、运动训练法……扩大对体育的宣传等，无一不协同体育部来贯彻协会的政策，甚至连青年童子部都大举出动，在全国或远东运动会上负责外宾接待、场地整理及观众秩序维护等工作。

## 三、优秀的人才

### 1、体育干事实力

(一) 外籍体育干事

表 1 青年会外籍体育干事学经历

姓名	来华时间	专长	重要事迹	备注
晏斯纳博士 Max J Exner	1908~ 1911	美国体育专家 善组织规划	1. 中国第一位体育专业干事。 2. 规划兴建上海青年会体育馆，拟定体育发展计划，筹体育运动人才训练处。 3. 促成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饶宾森 C. H. Robertson	1902	普渡大学教授 曾为该校 16 磅铭球纪录保持人 善演讲及宣传	1. 在京、津各地演讲并宣传近代体育。 2. 设计规划南开学校的体育课程及场地设备。 3. 提出举办远东运动会之构想。	天津 YMCA 总干事 (1905)
Hubbard	1908	美国 Amerst 学院体育系毕业 足球田径明星运动员	在天津各校担任体育教学工作	
格林 Robert Gailey	1898	普林斯大学橄榄球明星 曾被选为全美橄榄球最佳中锋	北京天津 YMCA 总干事	
蔡乐尔博士 C. A. Siler	1912~ 1926	篮球鼻祖李史密司的学生 长于各种运动及生理学、诊断病病学	1. 青年会上海体育专门学校教授。 2. 对篮球运动之推展不遗余力。	
克拉克博士 J. H. Crocker	1911	排球及各项运动技术 为国家级教练	1. 1914 年至厦门传授排球规则、技术与战术，并在福州各校开展排球运动。 2. 第一届远东运动会领导人之一，兼教练。 3. 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名誉干事，实际上负起一切筹备事宜。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近代教育

史温 A. H. Swan	1912	体育行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继 Exner 负起体育人才训练之责。</li> <li>2. 任上海体育专门学校教务长。</li> <li>3. 江苏省体育场指导人员训练班教师。</li> <li>4. 第一届远东运动会领队之一。</li> </ol>
麦可乐博士 C. H. Mccoly	1913~ 1919 1921~ 1926	任 Sout h Dakota 阿克顿学院橄榄球、篮球、棒球教练。 主修人体生理学、统计学及实用肌学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曾任多所大学体育系主任及教授。</li> <li>2. 中华教育改进社体育顾问。</li> <li>3. 全国体育研究会创始人。</li> <li>4. 中华业余联合会书记。</li> <li>5. 体育季刊编辑。</li> </ol>
侯格兰德 A. N. Hoagland		行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协助组织北京竞进会及华北体育联合会，并任秘书长之职。</li> <li>2. 负责第二次全国运动会的举办工作。</li> </ol>
葛雷博士 J. H. Gray	1919~ 1927	曾任印度政府体育顾问 孟买青年会体育主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将体育人才训练基地移至春田学院。</li> <li>2. 第五届远东运动会总干事。</li> <li>3. 第六届远东运动会领队。</li> <li>4. 领导中国成为国际奥林匹克会员国。</li> </ol>
孟列绰	1914	球类、体操、游泳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举办厦门体育教师训练班，调训体教师。</li> <li>2. 任厦门同文书院篮球教练，对福建一省体育贡献卓著。</li> </ol>
钟氏 T. K. Jonse		美国优秀篮球运动员也是橄榄球选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广州 YMCA 体育主任。</li> <li>2. 在广东一省讲授篮球规则和辅导篮球运动，对篮球运动的开展起了极大的作用。</li> </ol>

除上述人员外，尚有一些极优秀的体育干事分布于全国各地从事近代体育的推展工作，例如福州的理福铭（杨国卿）、广州的胡波利（梁田、向勤）、开封的顾平立（罗时铭）等人。



由表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批外籍干事，大多拥有博士学位及特殊体育专长，以此阵容从事体育事业的推展，其成就不难预期。

## (二) 本国籍体育干事

除外籍干事外，由青年会所培养之本国籍体育干事亦皆一时之选，他们无论在政府体育政策，民间体育组织、学校体育师资、课程、运动会筹备、选拔、参与各方面皆有极重要的影响力。今举较著名者如下：

### 1. 由青年会保送出国留学：

张伯苓、王正廷、郝更生、董守义、李友珍、张汇兰、梁兆安、郝伯阳、刘雪松、高扬威、许民辉、马约翰。

### 2. 由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培养之体育干事有：

吴蕴瑞、徐国祥、杨景锡、李文昌、王毅诚、王成栋、崔峙如、赵云路、涂文、郭毓彬等人。

### 3. 另与青年会历年来举办干训班及各种体育训练有直接关系者：

凌希陶、袁敦礼、高祥、高炎、宋如海、张信孚、章辑五等人。

他们有的是全国体育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如张伯苓、王正廷曾任中国体协名誉会长，而其中许多人也是这个组织的董事，如郝更生、董守义、许民辉……等。有的是大学体育系或体育部主任；如吴蕴瑞任国立中央大学、许民辉任东吴大学体育专修科、马约翰任清华大学体育系……。有的是教育部体育督学或体育委员如郝更生、董守义、许民辉……。这些人大部份皆在各大学任体育教师，同时负起历届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甚至奥运会的选拔、训练、考察工作……凡此种种，若详记其事功，恐将成浩浩巨册，故仅略述其要者。

透过以上人力资源之协同合作，青年会体育事业遂得以茁壮蓬勃，甚至一度主导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

## 第五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教育出版事业

基督教青年会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把注意力重点放在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群体上,既包括传统儒教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也包括现代新式学校里的学生。就像早期自由传教士们那样,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也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念,那就是,要想让中国归化于基督教信仰,就必须首先让那些必定成为中国未来领导者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接受基督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用过许多方法,其中包括举办演讲活动、奋兴布道会、夏令营以及圣经学习班,为官办学校输送教师,扩大教会服务工作人员队伍,积极投入平民教育与扫盲运动等。而所有这些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有赖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的文字作品的有力支持。

所以,出版书刊是青年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不仅是一种商业经营,从中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而更主要的是,它可以作为青年会的“橱窗”和“宣传喉舌”,传播青年会的基本思想,扩大青年会的影响,并结合不同的形势,发挥青年会在各方面的各种作用<sup>1</sup>。

青年会的书刊出版历史相当悠久。书刊出版事业虽然有高潮,也有低潮,但总的说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既有全国性的书刊出版,也有地方性的。以下拟介绍几个主要方面。

### 第一节 青年协会书局的创立与发展

青年会的出版工作开始于1896年,时任该会总干事的来会理先生在这一年创办了英文期刊《中国青年》,其宗旨是在会员中加强凝聚力意识。北美的青年协会有自己的书局,来会理当时也想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成立出版部,负责撰写、印刷和分销协会刊物。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直到1903年才在谢洪赉先生的帮助下成立了编辑部,作为全国青年会的一个下属部门,谢洪赉任总编辑。谢出身于苏州一位长老会牧师家庭,曾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在此之前曾在商务印书馆作过一段时间的编译工作。1914年,书报部更名为青年协会书局(Association Press)。

出版部的成立使得青年会在宣讲部之外又多了一个沟通文化知识界的渠道。出版部

<sup>1</sup> 转引自何凯利编著:《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生产出来的所谓“建设性的文字作品”<sup>85</sup>以传播基督教福音为宗旨，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青年会提出来的四字方针，即使青年人在德、智、体、群四育方面都得到发展。

在当时的新教出版机构中，通常都是外国人在编辑部占了压倒性多数，而新成立的青年会出版部这时却一反旧习，首开新风，从其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工作原则。与谢洪赉合作的还有两位中国编辑，一位是奚伯绶先生，早年从欧柏林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另一位是范子美先生，前清秀才出身，曾在林乐知手下做过《万国公报》的助理编辑。

谢洪赉于1916年去世，他的死对青年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谢一生曾写了许多本书，而且题材广泛，从《圣经研究导读》到《肺结核病的特点与治疗方法》，不一而足。正如青年会年报（1917）编辑按语中对他的评价，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创建之初的那些年代里，没有哪一位能比得上他在文字出版事工方面的卓著影响。

平民教育运动的成功给青年会特别是其出版活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财经状况，因为平民教育运动的创始人晏阳初先生曾经担任过青年会的干事之职。《平民教育千字文》课本第一版于1922年2月底由青年会出版部发行，在短短的5个月里，该书就卖出了200多万册。这给青年会出版部提供了一份不小的收益。

由于“排外”思想与“非基运动”的影响，1921年以后的一些年份里青年会的出版事工也与其他方面的事工一样，遭受到一些挫折因而有所倒退。一些主要针对学生读者群的出版物不像以前那么畅销了。在谢洪赉之后任主编之职的是胡貽毅先生。胡于1931年辞职后，接替其职务的是吴耀宗先生。

1927年吴耀宗先生从美国回来，进入青年会后首先担任的职务是全国委员会学生部干事。1930年到1932年间他任学生部的招待干事。胡貽毅辞职后，吴耀宗于1932年被青年协会书局任命为主编。吴耀宗热心于将有关基督教思想、伦理以及国外神学思想对社会问题和社会体制展开批评的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他亦有保留地致力于将基督教对社会问题的改革实践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一些保守派教士和中国本土教会领导人眼中，吴耀宗是当时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为了实现文字出版物在启迪青年思想，培养青年品德方面的重要功能，吴耀宗在1934年发起了一个三年计划。紧接着，吴耀宗又于1936年搞了第二个三年计划。但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该计划并没有完全得到落实<sup>86</sup>。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将编辑部迁移到内地去。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长时间的争论。支持内迁的一些编辑部干事们担心，一旦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出版工作就必定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何况那些正在编辑当中的书刊也许内地读

<sup>85</sup> 转引自陈秀萍编著：《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sup>86</sup> 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94页

者更需要。而那些反对内迁的同事则指出,只将青年协会书局编辑部内迁必定会遇到许多问题。除非是将整个书局迁到内地去,否则,编辑部内迁后如何与书局保持彼此间的行政联系;内地的印刷设施数量稀少,质量很差,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印刷成本。最严重的问题是西文著作在内地是罕见之物,如果缺少了这一部分出版物,整个书局的出版计划就势必会落空。经过一再商议,最后决定将青年协会书局的主要行政机构留在上海,只在成都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书局将新书的纸型从上海运到成都,由成都华英书局负责印制<sup>87</sup>。

1943年11月底,青年协会书局在成都的分支机构与其他基督教出版机构联合组建了新的“基督教联合出版社”。1945年日本投降后,成都的原青年协会书局分支机构又回迁上海并重新投入工作。青年协会书局设在上海市区的书店也于1946年10月重新开门营业。回归后的第一年,该书局出版的新书达12种之多,重印书刊也过9种。书店重新开业后当月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预期,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和其他基督教组织的大量订单,它们希望重新充实战争期间损失了的图书收藏或是购买书刊作为礼品送给会员。1946-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全社会普遍的不稳定环境使得协会书局的出版事业瘫痪下来。尽管当时尚有三个已经计划好了的丛书出版计划,但最后还是没有来得及出版。1951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之后,青年协会书局终于关门。

## 第二节 青年协会书局的主要发行刊物

青年协会书局在1902-1951年共计49年的经营期间里,在编辑和出版方面取得了显著的业绩。据统计,共出期刊6种,图书550余部,还有少量小册子。在所有这些出版物中,中国作者撰写的原创作品有190部,约占1/3。与其他基督教出版机构相比,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也是协会书局的一个特点<sup>88</sup>。

协会书局的第一份期刊——《学塾月报》(英文版)在1896年创刊时是一份半年期刊物,不久就改为月刊。这份杂志主要是为新闻记者、英语的海外中国青年、归国留学生和国内高校毕业生服务。该刊还被一些对基督教青年会事业感兴趣的外国人视为重要的媒介。有报告显示,这份杂志在1913年的发行量曾达到1300册,可惜不久就于1916年停刊了。

中文版的《青年》于1909年创刊。作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展教育工作的一个载体,它首次发行便采取月刊的形式。该杂志使用白话文体,编辑是谢洪赉先生。后来这

<sup>87</sup> 范子美:《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载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第34页

<sup>88</sup> 转引自何凯利编著:《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份刊物成了基督教青年会的机关刊物，其主要宗旨是为促进青年们对《圣经》的学习，介绍教会和青年会的有关活动，为教会提供服务<sup>89</sup>。有报告显示，这份刊物每期的发行量早在1912年就达到了6500册。为了进一步扩大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又于1911年创办了另一份期刊：《进步》。这份新期刊的宗旨是试图用基督教的立场与观点来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同时又避免与那些对基督教尚不太了解的社会人士形成对立。1917年3月，《青年》与《进步》合并，形成了一份新的期刊——《青年进步》，该刊一直办到1931年才停刊。此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还创办了两种期刊：《同工》（1921-1949）与《消息》（1928-1951）。它们分别以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的读者为主要对象。

青年协会书局的专题类出版物一般都是使用白话文，说理深入浅出，语言文字风格多样。特别是对一些关于生活与健康方面的临时性大众知识读物，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阅读能力，则一定采用白话文。对于其他新教出版人感兴趣的灵修小册子，青年协会书局只出版了为数很少的几种。这也许是由于青年协会书局将主要精力放在学生知识分子这一类读者上的缘故。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眼中，基督教信仰方面的读物如果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就显得有点被人瞧不起的小家子气。

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物考虑的读者对象是社会中接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阶层，其中大部分是大、中学生。有一部分出版物内容涉及宗教信仰与生活实践，目的是为了促进基督教信仰及其社会服务事业的向前发展，另外还有一部分出版物专事介绍现代科技知识，以便那些从事教会和青年会工作的青年学生更好地在各自的组织机构中开展工作。

协会书局的图书出版物大多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这是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物的另一特色。青年协会书局发行的丛书系列总共超过20套。每一套丛书系列的名称都各不相同。其中最大的一套是“青年图书室丛书第一套”，收入图书多达50部；而最小的一套“基督徒作家丛书”仅收入了3本这方面的著作。

通过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的图书的分析，可以看出该局在图书题材方面的侧重点。

青年协会书局没有属于自己的印刷厂。其印刷业务最初交由汉口卫理会书局负责，从1897年以后则委托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发行工作则交由青年协会书局的业务部来完成。所有图书都经由青年会上海中心书店发往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会与基督教学生同盟。除此之外，青年会业务部还在日报、周报和月报上刊登了直销广告或举办促销活动。促销活动又分付费与赠送两种。在青年会期刊的封面上经常刊载新书出版启事，并附有空白订购书单以便潜在的用户填写，并在特别活动日期摆设书籍展览摊位。与其他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相比，青年协会书局的出版业务更多地属于一种自养型。书籍销售

<sup>89</sup> 余日章：《基督教青年会史略》，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发行，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编号U120-0-383，第34页

收入、杂志征订费收入和广告收入可经弥补青年协会书局在出版发行过程的大部分费用开支。

20世纪30年代，由于战争毁坏了交通干道与邮政线路，青年协会书局的销售业务实际上仅限于上海市场。这时，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基督教青年会与基督教学生同盟都因为日本军的入侵而被迫关闭了。因此，青年协会书局的出版物销售量在抗日战争期间锐减，从而财政问题也在这个时期暴露得非常突出。事实表明，青年协会书局在抗战期间推出的五年出版计划几乎没有一项不是借助外界的基金支持才得以完成的。这些基金组织包括尚爱纪念基金、图书促进基金、长老会中国联合会、金陵神学院以及中国基督教教育联合会。

青年协会书局是一个完完全全由中国基督徒开办的新教出版机构。但若是把它与其他新教出版机构相比，无论从财政预算上还是从职员人数上，它又是规模较小的一个。在那个时代，青年协会书局的出版物被公认在思想上是比较先进的。它出版的一些优秀译作和原创作品涵盖了宗教、哲学、文化和社会学诸领域。从总体上来讲，这些出版物都是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作为对象，向他们介绍了许多有关人文以及科学的理论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他们关心和参与某些社会问题的讨论，其社会影响不可忽视<sup>90</sup>。也正因此，青年协会书局在当时曾被许多人视为“社会福音”的先驱，而基督教中的一些保守派则对它不怎么喜欢。

### 第三节 《青年进步》对中国青年的影响

前面说过，为了扩大青年会的影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1917年将创刊于1909年的期刊《青年》和创刊于1911年的期刊《进步》合并，更名为《青年进步》(Association Progress)。《青年进步》作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机关刊物于1917年开始出版发行，每月一期。该刊主编范子美曾经这样阐述刊名意义和办刊宗旨：

《青年进步》当然就是要使青年人进步。那么青年人如何才能取得进步呢？这就必须通过四种美德的培养，只有在品德、知识、身体和协作精神四个方面都取得进步，青年人才能对家庭、社会和国家有所作为。我们的目标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在青年人追求进步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鼓励和指导。我们并不打算给他们提供激进的或是时髦的忠告，而是要向青年人提供一些没有偏见的、客观的建议……尽管我们始终如一地关心宗教问题，但不准备将这份刊物办成一份宗教性的刊物；尽管我们始终如一地关心科学话题，但不准备把它办成一份科学方面的刊物；尽管我们始终如一地关心体育活动，但

<sup>90</sup> 谢扶雅著：《青年会的深远影响力》，载于《谢洪雅先生晚年文录》，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3年，第83页

不准备将它办成一份体育杂志…我们希望培养在四个美德方面全面发展的青年<sup>91</sup>。

主编范子美的这段话明确地阐述了《青年进步》的办刊宗旨，也表明了该刊的基本倾向和基本内容。应该说，这在当时可能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

1917年3月《青年进步》第一期刊世。每期都有120个左右的中文页面，印刷精美，有汉、英双语索引和广告。广告内容涵盖很广，从矮克发洋和行(Agfa China Co.)、大华保险公司到牛津大学出版社、益兴牙刷公司等等，不一而足。创刊后头9个月的发行总量为46975册，接下来的1918年全年发行总量增长为52416册。学生和各地青年会组织是该刊物的主要订户，后者用该刊物来培训会员和骨干分子。

该刊物每期的内容通常分作10个栏目，据编辑概述的各栏目分类如下：

德育—宗教、道德伦理、哲学和德性修养。

智育—政治、教育和应用科学。

体育—个人和公众卫生，游戏和运动。

社会服务—人际关系、社会风俗和慈善事业。

会务—青年会的宗旨与活动。

经课—基督教的经义与教旨学习。

通讯—城市青年会、学校青年会以及世界青年会的消息。

记载—国内外大事、时论。

杂组—各种文学作品，如文苑、笔记、故事、小说。

还有书评与读者来信栏目。

各栏目的文章数量并非平均分页。按照编辑的说法，文章分布的多少是当时需求的反映。比如，前30期(1917-1920)《青年进步》中发表了大量有关培养良好人格方面的文章。因为该刊编者认为，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来说，人格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每一期《青年进步》都刊载有3-4篇有关人格培养、人生价值与事业成功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所传播的人生理想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从中国哲学家到基督教教义。这方面的文章有：《现代青年人之人格》(第7期)、《人生价值之衡定》(第9期)、《理想的完人》(第13期)、《人类之责任与自由》(第28期)，以及《青年修养道德之要端》等等。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由中国人撰写的。其中又以范子美写得最多，他的文章后来还汇编成一本书，名为《他山之石》。

《青年进步》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是积极而又冷静的，所载关于这场运动的文章不到8篇。一方面，该刊认为中国传统和社会确实需要重新评估和改革，但同时也警告人们操之过急可能会带来的危险。这种态度反映在下面一些文章中：《德谟克拉西的反面》(第29期)、《论预防过急主义》(第29期)、《什么不是德谟克拉西》(第39期)。然而，该刊非常强烈地赞同文学革命。在仅有的与此相关的两篇文章中便可看出，作者是何等

<sup>91</sup> 范子美：《青年进步发刊词》，载于《青年进步》第1册，1917年，第1页

急切地呼吁人们起来积极采纳新的白话文体。这两篇文章的标题是《新文学的感想，旧文学的系思》（第30期）和《文学革命的历史观》（第31期）。事实上，《青年进步》杂志从第12期起（1920年1月）就已经采用白话文了。

该刊在20世纪20年代里的一大特色是经常出版特刊号。主编范子美解释说：“出版特刊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需要，其中的文章都是名家作品或是从西文选译过来的。”总共约出版有20期特刊，它们有：

《体育研究号》（第36期）强调体育运动在培养个人健康体魄、好公民和强大的民族方面的重要性。

《儿童问题》（第46、48期），讨论儿童成长的生理与心理层面，以及儿童成长过程中要注意的教育与宗教问题。

《家庭问题》（第49、61期），探讨东、西方家庭发展史，以及正确的家庭关系。

《两性问题、婚姻问题》（第65、75期），讨论新式性道德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圣经》中有关两性与婚姻关系的道德与平等问题。

《劳工问题》（第57、62期），比较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劳工问题，以及教会在解决这类问题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

《非战主张》（第78期），谴责战争和军阀主义的邪恶，并提出了教会在防止战争方面可以采取的建设性途径。

《国际问题与基督徒》（第85、106、109和131期），论述教会在推进国际友好与和平方面可遵循的途径与方式，还刊载了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缔约大会上的各种报告。

除了上述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特刊之外，《青年进步》也出版有关教会活动方面的特刊。1922年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该刊于同年2月为此出版了一期纪念特刊（第50期），还出版过一期纪念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首届大会的特刊（第52期）。

《青年进步》杂志本身并没有直接卷入非基督教的运动中去。不过，该刊开辟了一个新专栏，对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进行研究和宣传。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它似乎也不太感兴趣，仅仅刊载了三篇文章，对人们谴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做出回应。这三篇文章是：《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第99期）、《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第99期）和《宗教的革命观》（第103期）。该刊对于近代不平等条约持坚定的反对立场，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外国特权和租界（第108期）。

《青年进步》在如何通过对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讨论传播基督教教义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该刊语言朴实，观点明确，读者通常都将它视为良师益友。当然，该刊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很多都善于引用《圣经》教训和教会领袖的话，其基督教的特色非常鲜明，但与同时期的其他新教刊物相比，《青年进步》还是表现出一种带有自由派倾向的杂志。今天看来，由于对德、智、体、群的理解总是受一定时代和人们的观念的制约，因此很



难说该刊的目标—培养在四个美德方面全面发展的青年的主旨是否都达到了。只能说,从某些方面来看,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它的局限性。

#### 第四节 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青年会刊物

许多省市的青年会都结合本地的情况,举办当地的刊物,以便更好地联系当地的会员,取得更好的宣教效果。在这里,只想介绍福建省福州市和厦门市青年会所办刊物的概况。

福建省内基督城市青年会发展较为完备的两个市会是福州青年会和厦门青年会,也只有这两会才具有连续文字出版、宣传会务和基督精神的实力。

福州城市青年会曾刊出《福州青年》(《福州青年会报》),它创办于晚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尚在连续出刊,是民初省垣较具影响的几个有基督色彩的出版物之一。《闽南青年》(1915年10月创刊)即《厦门青年》,连续出版的时间更为持久,在厦门的影响较大。本节试以这两刊现存的残本来作些文字上的重新认识。

《厦门青年》由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印行,民国25年起,按月出版,发行量千余。其发行宗旨在于“联络感情,报告会务,与夫各级机关暨各地市校会互通声色”<sup>92</sup>。最初的《厦门青年》由厦门青年会学术部编辑,由会外印刷局印刷,例如风行印刷社等。当时厦门青年会总务部仅备有“手印匣,自印信笺、信封、名片等小型印件”。由于会内印刷条件的限制,青年会的文字事业不甚昌明。到民国26年,才采购四开或六开纸型印刷机一部,以应付全部印刷需要,并节省印刷费<sup>93</sup>。《厦门青年》作为厦门青年会重要的文字出版物,其发行范围主要是会员,目的是进行沟通和交流,也寄送一些给各学校存阅。其内容除刊载有关会务消息外,大多着力宣传基督福音主义,也关注社会改良思想的宣传和鼓吹。从该刊所载内容我们可以全窥青年会活动的大要,以月为时间单位来统计的话:月中青年崇拜四次,其余如各类运动比赛、常会、学校(夜校等临时学校)授课、演讲会以及青年会在住宿、餐饮、洗浴等方面的营利服务,另外还有为人工力车及其家属送医、施药等活动。刊内设有“个人消息”一栏,多登载一些会员的近况摘要,从中可以得知会内干事会员大多肩负(多为兼任)社会福利慈善、学校、医院董事等非政府机构和政府所设各类委员会的职务,几乎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有涉及。

随着青年会的组织活动把触角伸向非教会学校,如在厦门大学、厦门同文中学、双十中学也成立有青年会组织,《厦门青年》也经常予以报道。这些学校的青年会除组织一些公益活动如民众歌咏班、游泳班、夜校、音乐班、英文班和国语班外,对政府提出的各类纪念活动也热心参与,如“孙总理诞辰纪念、双十国庆、蒋委座寿祝祷会”,其

<sup>92</sup> 《发刊词》载于《厦门青年》第1期,民国25年,第1页

<sup>93</sup> 《总务部节流》载于《厦门青年》第26卷第2期,民国26年,第36页

至还组织“蒋委员脱险庆祝会”(西安事变)等,而且规模可观。对所有这些活动,《厦门青年》都用醒目的文字在显眼的地方大加宣传,以显示他们的政治倾向。青年会的教会背景决定了它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热忱:每逢宗教节日,或全国性、全球性之教会性的宗教活动,都出力进行配合宣传。如主日举行崇拜会更是不可少的。儿童主日学习班是为“童界德性之陶冶与教育之灌输”而举办的,另外还有查经班、布道、益智、励行、灵修等活动,名目繁多。与教会合办的基督教青年修养会对于“宗教经验、人生真谛”的感情铺垫不遗余力,这也是青年会组织的。而《厦门青年》作为青年会的舌喉,对会内的各种宗教活动,哪怕同期有相同组织的相同活动,也从不同方面进行采访报道,不厌其烦。青年会会员互称“同工”与教会组织内称呼相一致。《厦门青年》对青年会的商业经营活动也大肆渲染,每期必有青年会的广告以招徕客源。宣称宿舍部“为谋求住客认识基督教真理起见,特于每房置圣经一本,俾住客业余得以浏览”等等。可见其宗教宣传真是无微不至。除了登载会内广告外,《厦门青年》还“招登广告”,从事广告经营。这一点与教会其它组织所出刊物只登教会内广告极具差别,也是厦门青年会作为教会外围组织从事世俗社会活动较深的又一表现。

与全国青年会出版物的经历的一样,早期的《厦门青年》也着重于宣传宗教。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则侧重于社会改良意识的宣传,以呼应当时全国教会的改良主义思潮。到30年代,除继续大量宣传基督社会福音主义的意识外,又增加了鼓吹不抵抗主义和反共意识等消极抗日的言论。但无论在哪一时期,《厦门青年》一直都把教会的信仰事业作为自己的基本事业。而其社会改良主义的基本态度也决定了它在抗战前夕或抗战中都只是“从来不会沸起的温水”。1936年12月全国反日宣传已热火朝天,而厦门青年会一边组织全国青年协会学生干事刘良模的《基督徒学生救亡运动》演讲,但一边又组织“厦门金鱼展览会”,提倡什么“高尚娱乐,促进爱美品性”,与当时的救亡情绪唱反调。而《厦门青年》也秉承青年会的改良主义和宗教组织的“超然”态度,以比介绍刘良模的爱国行动更大的版面和更多的文字对“金鱼展览会”进行渲染。青年会的所谓“救亡”仅限于“为国公祷”、“举行民众歌咏会”等,而且会内的救亡运动也多以个人名义自愿参加。可见,如果说《厦门青年》的涉世是教会组织中较深的话,那么只能是就商业上而言,它对于救亡的政治行动也是冷漠的。

《福州青年会报》也是一份历史较久的刊物。它由福州青年会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自称为“福州基督教青年会,为福州基督教同宗惟一服务社会之机关”<sup>94</sup>。初期以无标点的文言文形式出版,不定期。第一年发行期数不详,第二年发行三期,第三年不详。第四年由于福州青年会筹划建筑新会所,工作纷繁,编辑人员不能专司其职,停刊一年。第五年本拟月出一期,每月二日出版,但因无专司编辑的人员,故常滞迟出

<sup>94</sup> 《福州基督教青年会消息》载于《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通信(福州版)》第10期,民国33年,第73页

刊。发行至第七年，刊名变为《福州青年》，改为每星期出报一张，每月底之星期则出月报一册。该刊从发刊起，一直在会内发行，且为免费赠阅，所以在内容上极倾向于会闻消息等。但该报作为福州青年会的宣传喉舌，并以“纯尽义务，开启青年”为出刊的实践宗旨，故自始至终也宣称要以“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后来又加上“群、育”共称“五育”）来教化青年，促进社会改良。而且，它的这种社会改良取向并未随全国、福建局势的改变而改变，这也是该刊的特色之一。

青年会经常自称为“品高而价廉之一俱乐部，充积基督教真理而不染尘俗气味，与涵有政治性质之团体绝异”，会内“无宗派之分，而为各公会代表所管属，此所以保存基督教的性质而不使与教会同样也”<sup>95</sup>。还宣称青年会的入会会员并非全部都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所占比例甚至远远超过基督徒会员；青年会的各种设施如藏书楼、健身房、澡浴室等，不论信教的或不信教的人，皆可一律享受。所以，在青年会的刊物中，大力宣称它主要以“改良社会恶习，宣传博爱、自由、平等与牺牲服务诸主义”为价值根底，并不是以基督信仰为出刊宗旨的全部。有关“研究圣经，冀收灵益”的宣传相对较小，而关于“三育”的言论较多，其中主要涉及青年的修身，如拒吸毒、拒赌博、卫生、节俭、救国等等。另外，不时由青年会聘请各种要人来会演讲，内容大多集中于科学方面，青年会的刊物也将这些演讲加以报道或介绍。例如，美国实业家高智安在福州青年会的演讲词：《钢铁之制造》，医学博士古雅各的演讲词：《最新发明免病法》等，均曾被撮要在《福州青年》中刊出。这对在青年中普及科学知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刊物还涉及青年娱乐方面的内容，并特别关注简要介绍许多西方现代体育娱乐活动。这也有其积极意义。

由于青年会的社会改良主义态度，所以，青年会虽具有基督教的性质并与教会有密切关系，但又不像教会那样热忱于宣传宗教。这也是青年会力图避免周围社会以“教会之佣”来评价和称呼它的有力对策。青年会宣称“率循基督模范”，增强基督人格精神的鼓舞，“改良社会陋习”，这既是以除却神格后的基督精神鼓舞人们的行为的目标，也是青年会立会的旨意。总的说，《福州青年会报》是秉承青年会的这种旨意，不把布道基督作为该刊的重点内容。综观所见到的现存该刊，可以发现其直接的宗教说词和宣教较其它教会刊物为少，宗教的道德说教大多潜隐于其有关文章的蕴涵之中<sup>96</sup>。

应该指出，《福州青年会报》从创办到停刊为止，都一直作为福州青年会的会刊。它除却偏颇的宗教宣教外，也随着福州青年会会务的不断扩大，而着重增加会内要闻信息的报道。甚至为解决出刊资金的短缺，不得不在刊物中增加登载会内外广告。但总的说来，该刊与社会的联系，是依籍其对青年的道德规劝和新式文明的引进、介绍来推行

<sup>95</sup> 《基督教青年会小评》载于《福州青年会报》第6年第4期，1916年，第58页

<sup>96</sup> 黄毓泌：《记福州青年会、福州联育社》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19年，第170页

的，并力图避免教会式的宗教布道。所以，可以认为，作为教会附属机构的青年会的出版物，《福州青年会报》最具代表性的是：欲盖弥彰的宗教劝说遁形于道德话语的宣教之中，其基本意图是创造信仰良机。因此也可以说，青年会组织的文字宣传是染了色的宣教喉舌，尽管其社会改良主义倾向有时也显得颇为鲜明，但始终不会完全抹去其基督思想的底色。

城市青年会的文字出版物，由于城市青年会所参与的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它在内容上也表现得斑驳杂芜，难以用固定的世俗观点对其做出简单的评价。这类出版物一般也反映时局，不过在对时局的态度上一般却萎缩得趋于保守，从而表现出保守的改良主义；它虽宣称奉行服务社会人群的“社会福音主义”，但实质上却热中于宗教的福音主义。

“热心主道，努力社会”既成为城市青年会会员包括有基督教倾向的非基督会员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也就成为《厦门青年》、《福州青年》等一批城市青年会出版刊物宣传福音的基础和内张力。

## 结 束 语

基督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华民族，作为基督教会创办的社会和宗教团体，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敬重老成和经验的国家里，创造了一个以青年为主题的运动。在国家和社会转型的时代，给一部分青年准备要脱离旧势力的束缚、想走没有人走过的路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表现的机会。在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冲击之下，青年会并没有消亡，它所从事的社会服务活动使它得以幸存并且逐步得到中国民众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青年会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的宗旨，无论是在发展时期，还是在受挫之后，始终坚持社会服务，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它积极组织 and 参与救亡济贫、服务学生和帮助抗日将士的活动，以自己的真诚服务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理解，国共两党对青年会在抗日时期的服务都持有肯定的态度。

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尤其是对其传播西方文化的活动要作较全面的分析。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之一，它传播的宗教文化有消极的因素。但更应看到它传播西方文明和先进的科学知识的积极的一面，并在思想上给予中国青年以启蒙。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论及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改革的影响时，提到对中国的西方教育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从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 1885 年到中国直到 1949 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社会教育领域是基督教青年会最重要的活动领域，它从事社会教育活动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变迁的基本趋向。青年会的社会教育活动主要围绕德、智、体、群四个方面展开，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对民国时期社会变迁的顺应和促进是显而易见的。

## 主要参考书目

### 一、英文著作和论文

1. Boynton, C.I. and C.D. (ed.),  
*The Handbook of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Protestant Auspices.*  
Shanghai, 1936
2. Mathews, Basil John,  
*R. Mott World Citizen.* London, 1933
3. Grand Rapids William  
*John. Mott 1865-1955* B. Eerdmann Publishing Co., 1979
4. Shirley S. Gamett,  
*Social Reformers in China-the Chinese Y.M.C.A 1885—192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5. Xing Wenjun,  
*Social Gospel. Social Economics and the YMCA: Sidney Gamble and Princeton-in Peking*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922. Ph. D Dissertation.
6. Risedorph. Kimberly Ann,  
*Reformers, Athletes and Students: the YMCA in China. 1895-1935.*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4, Ph. D Dissertation.
7.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 1919-1937* Bethel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6
8. Keller, Charles Andrew,  
*Making Model Citizens: The Chinese YMCA. Social A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17-1937*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6, Ph. D Dissertation.

### 二、上海市档案馆资料

- 1、《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35年，馆编 Q0-8-15
- 2、《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米会理，馆编 U-120-0-63
- 3、《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米会理，馆编 U-120-0-64
- 4、《城市基督教青年会组织须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市会足印型，1933年，馆编 U120-0-84[2]

- 5、《青年协会书局简章》1930年，馆编 U120-0-84[6]
- 6、《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概论》 馆编 U120-0-90
- 7、《青年会历史概述》傅若愚讲授、袁磊整理，1949年，馆编 U120-0-65
- 8、《中华基督教学校青年会统计表——1918年》 馆编 U120-0-74[1]
- 9、《中华基督教城市青年会统计表——1922至1930年》 馆编 U120-0-74[2]
- 10、《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民国二十年——二十七年年鉴》 馆编 U120-0-（18-25）
- 11、《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详编》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1920年，馆编 U120-0-34
- 12、《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公民教育部》 馆编 U120-0-43[4]
- 13、《青年会教育事业调查报告》教育调查团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印行，馆编 U120-0-44
- 14、《青年会干事养成专门学校体育科说明书》1918年，馆编 U120-0-49[3]
- 15、《北平青年会情况简介》 馆编 U120-0-92[3]
- 16、《基督教青年会的信仰基础》 馆编 U120-0-99-[1]
- 17、《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之过去、现在、将来》 馆编 U120-0-101-[1]
- 18、《平民教育运动》 馆编 U120-0-101[2]
- 19、《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专题研究报告》 馆编 U120-0-114
- 20、《德智体》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馆编 U120-0-120[1]
- 21、《人格救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馆编 U120-0-120[2]
- 22、《合作救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馆编 U120-0-120[3]
- 23、《中国青年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馆编 U120-0-120[4]
- 24、《人格建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馆编 U120-0-122[3]
- 25、《曙光中的青年会》 馆编 U120-0-121[1]
- 26、《烈火中的青年会》 馆编 U120-0-121[2]
- 27、《青年进步 1917年——193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编，馆编 U120-0-（128——157）
- 28、《同工 1924年——1957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同工通讯社编，馆编 U120-0-（163——178）
- 29、《力的创造——上海青年会三十五周年纪念册》华丰印刷铸字所承印，馆编 U120-0-234
- 30、《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十周年纪念》 馆编 U120-0-250[2]
- 31、《福州青年——会务报告特刊》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发行，馆编 U120-0-257[1]

### 三、中文著作和论文

1. 谢扶雅著：《袁洪赉与青年会》，《略述余日章之一生》，《马伯援付略》，《忆徐宝谦—

26. 谢洪赉:《青年会代答》上海青年会总委会发行,1911年
27.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报告
28. 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报告书,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行
29. 袁仿赉:《余日章传》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
30.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1925年
31. 艾迪:《基督教纲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4年
32. 许师慎:《国父革命缘起详注》中正书局,1947年
33. 陈文渊:《宗教与人格》上海青年协会,1935年
34. 艾迪:《宗教与社会主义》上海青年协会,1931年
35. 艾迪:《思想的探险》上海青年协会,1936年
36.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37. 史静寰 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38. 陶飞亚 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39. 高时良 陈名实:《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科学文化》香港人民出版社,2004年
40. 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 1979年
41. 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论文集》今日中国出版社
42. 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宇宙光出版 1985年
43. 张西平:《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
44.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45. 胡卫清:《普通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46. 叶仁吕:《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久大文化公司 1992年
47. 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 1997年
48. 姚民权:《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年
49.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8年
50. 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
51. 何凯利:《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